

秦代簡牘文書學的個案研究—— 里耶秦簡 9-2283、[16-5]和[16-6] 三牘的物質形態、文書構成和傳遞方式

馬增榮*

出土號[16-5]和[16-6]的兩件木牘屬於里耶秦簡中最早公布的一批材料，當中載有洞庭守禮於秦始皇廿七年（前 220）就興發勞動力運輸甲兵一事向屬縣發出的指示。關於這兩件木牘引申的文書處理問題，學界已累積了相當多的討論，惟受材料所限，一直未能找到突破點。《里耶秦簡（貳）》中新公布的 9-2283 牘，內容和形制上與[16-5]和[16-6]兩牘明顯相關，有助我們回應目前研究中未解的難題；更重要的是，通過分析三牘上的反印文和編繩痕跡，我們可以復原其存放形態，為研究秦代文書處理與存檔習慣提供了一個極佳的案例。9-2283、[16-5]和[16-6]三牘上反印文顯示，三者曾疊在一起存放，配合三牘上的編繩痕跡分析，本文推論三牘在編聯後曾以「折頁」方式收納。三件木牘均曾按「以道次傳別書」的方式傳送至遷陵縣，但由於洞庭郡守禮初次下發文書時，沒有指明行書路線和下令屬縣相報書回覆，因此[16-6]和[16-5]兩牘先後重複從鄰縣傳抄至遷陵縣。載有洞庭郡守禮追加補充內容的 9-2283 牘則是三件木牘中最後抵達遷陵縣的。結合三牘的疊壓次序分析，本文指出冊書的編聯次序與三牘抵達遷陵縣的次序相反，最晚抵達的放在冊書之首，最早的放在冊書之末。以上發現或可讓我們重新反思目前秦代文書形態的諸多問題。

關鍵詞：里耶秦簡 遷陵縣 反印文 折頁 傳遞方式

* 澳門大學歷史系

本文為澳門大學 Start-up Research Grant（檔案編號：SRG2019-00172-FAH）資助的研究成果之一。

一・前言

出土登記號為 [16-5] 和 [16-6] 的兩件木牘屬於里耶秦簡中最早公布的一批簡牘。¹ 兩牘正面文字相同，筆跡接近，均載有秦始皇廿七年（前 220）洞庭守禮就興發勞動力運送甲兵一事，對轄下屬縣和相關官員的指示；只有背面遷陵縣的收文、處理和發送紀錄在內容和筆跡上有異。關於這兩件木牘引申的文書處理問題，學界已累積了相當多的討論，但一直未能找到突破點。² 其實早在二〇〇六年，邢義田已引用發掘者張春龍於二〇〇五年八月十一日的來信，提及 [16-5]、[16-6] 和 [16-7] 三件木牘在出土時曾疊放一起：

可以肯定的說，里耶簡的埋藏極為零亂和分散，疊放的僅第九層一至十二

¹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文物處、龍山縣文物管理所，〈湖南龍山里耶戰國——秦代古城一號井發掘簡報〉，《文物》2003.1：33-34；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文物處，〈湘西里耶秦代簡牘選釋〉，《中國歷史文物》2003.1：20-22；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里耶發掘報告》（長沙：嶽麓書社，2007），頁 192-194。兩牘後又收入里耶秦簡博物館、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中國人民大學中心編著，《里耶秦簡博物館藏秦簡》（上海：中西書局，2016）。本文引用兩牘圖版皆據此書。此外，整理者在目前的出版物中同時使用了出土號和整理號。為方便查對，本文主要採用通行的整理號，凡需要引用出土號時，均用[]相區別。關於里耶秦簡的編號問題，參 Robin D. S. Yates, “The Qin Slips and Boards from Well No. 1, Liye, Hunan: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Qin Qianling County Archives,” *Early China* 35/36 (2012/13): 295；張忠偉，〈里耶秦簡博物館藏秦簡概說〉，里耶秦簡博物館、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中國人民大學中心，《里耶秦簡博物館藏秦簡》，頁 2-3。

² 例如胡平生，〈湘西里耶秦簡〉，胡平生、李天虹著，《長江流域出土簡牘與研究》（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頁 319-323；王煥林，〈里耶秦簡校詁〉（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7），頁 168-176；藤田勝久，〈中国古代国家と社会システム—長江流域出土資料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09），頁 154-163；呂靜，〈秦代における行政文書の管理に関する考察—里耶秦牘の性格をめぐって—〉，《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158 (2010)：270-266 (11-15)；陳劍，〈讀秦漢簡札記三篇〉，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 4 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頁 374 注 1；陳偉，〈關於秦文書制度的幾個問題〉，渡邊義浩編，《中国新出資料学の展開：第四回日中学者中国古代史論壇論文集》（東京：汲古書院，2013），頁 43-53；單育辰，〈里耶秦公文流轉研究〉，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主編，《簡帛》第 9 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頁 199-210；楊振紅、單印飛，〈里耶秦簡 J1(16)5、J1(16)6 的釋讀與文書的製作、傳遞〉，《浙江學刊》2014.3：16-24；鷹取祐司，〈秦漢官文書の基礎的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15），頁 260, 269-270 注 33；初山明，〈秦漢出土文字史料の研究—形態・制度・社会—〉（東京：創文社，2015），頁 150-153，等等。

號簡和第十六層五、六、七號簡，黏連在一起的僅第八層一五四至一五九號簡。³

這則消息可謂相當重要。我們不但藉此得知這三組簡牘的出土情況，而且可知在[16-5]和[16-6]以外，還有一件內容相關的[16-7]木牘。[16-5]和[16-6]兩件木牘中難解的環節或可通過[16-7]牘來補充。可惜的是，目前討論[16-5]和[16-6]兩牘的學者，均未重視這則消息，因而假設這兩牘中所載的訊息能完整反映當時相關文書的製作和傳遞之全貌。

二〇一五年九月七至八日，筆者到訪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有幸承庫房人員提取出土登記號[9-2289]牘參觀，因此得知在已公布的[16-5]和[16-6]兩牘外，尚有一內容相關的木牘，但對於三者的關係仍有很多的疑惑。次年，藏於里耶秦簡博物館的簡牘整理出版，張忠偉在〈里耶秦簡博物館藏秦簡概說〉一文披露了許多從張春龍處得知的第一手消息，其中再次提到[16-5]、[16-6]和[16-7]三牘的出土情況：

井下發掘時，成組出現者有三例，依次是8-154至8-159、9-1至9-12、16-5至16-7；前者黏連在一起，後兩者是疊放的（二〇一六年三月三日張春龍先生電子郵件）。⁴

張忠偉的轉述確認了此前邢義田所引消息的可靠性。比較兩位學者轉述中提及的三組簡牘，⁵第一組出土號[8-154]至[8-159]，基本上可與後來的整理號8-154至8-159對應，只有[8-155]和[8-156]在整理出版時對換了編號。目前的研究認為，[8-152]、[8-153]、[8-156]、[8-158]和[8-159]可構成一組內容相關的獨立文書。⁶換言之，成組出土的[8-154]至[8-159]，當中至少有[8-154]、[8-155]和[8-157]三件木牘在內容上並不相關，反而內容相關的[8-152]、[8-153]並未

³ 邢義田，〈湖南龍山里耶 J1(8)157 和 J1(9)1-12 號秦牘的文書構成、筆跡和原檔存放形式〉，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主編，《簡帛》第1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後收入氏著，《治國安邦：法制、行政與軍事》（北京：中華書局，2011）。本文據後者，參頁481注20。

⁴ 張忠偉，〈里耶秦簡博物館藏秦簡概說〉，頁15。

⁵ 兩位學者引述的均為出土號，因此這裏以出土號討論。

⁶ 參于洪濤，〈里耶簡「御史問直絡帶程書」傳遞復原——兼論秦漢〈行書律〉的實際應用〉，王沛主編，《出土文獻與法律史研究》第2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頁43-60；廣瀨薰雄，〈也談里耶秦簡〈御史問直絡裙程書〉〉，氏著，《簡帛研究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頁117-136。

「黏連在一起」出土。因此，可以說 [8-154] 至 [8-159] 成組出土，並不能反映最初的存檔情況。與此不同，[9-1] 至 [9-12] 是疊放在一起出土，且有反印文可以為證，透露了最初的存檔狀態。[9-1] 至 [9-12]（出土號與整理號相同）木牘上反印文反映的疊壓關係，經過學者的反覆討論，已經比較清楚。⁷ 目前最新的研究指出，儘管這十二件木牘出土時疊在一起，但 [9-6] 正面和 [9-10] 背面尚有無法對應的反印文，因此在這十二件木牘以外，或可能還有其他曾疊在一起的木牘。⁸ 至於 [16-5] 至 [16-7] 木牘，由於 [16-7] 尚未發表，加上藏於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 [9-2289] 一牘，它們之間關係仍然成疑。這些疑問終於因為《里耶秦簡（貳）》的出版得到解答。

二〇一七年底，《里耶秦簡（貳）》距離第一卷五年後終於正式出版，該書公布了 9-2283 號木牘的圖版和釋文，其正面主要內容與 [16-5] 和 [16-6] 兩牘正面內容基本相同。⁹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九日，筆者獲張春龍的電郵確認，邢義田和張忠煒兩位學者提到的 [16-7] 牘，即是《里耶秦簡（貳）》收錄的整理號 9-2283 牘，亦即筆者二〇一五年於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看到的出土號 [9-2289] 牘！¹⁰ 三件木牘的完整公布，不但可以解答昔日未能解決的問題；更為重要的是，三牘上的反印文和編繩殘跡，讓我們可以了解它們之間的疊壓和編聯情況，為研究秦代的文書處理和存放習慣，提供一個不可多得的案例。

本文先通過考察 9-2283、[16-5] 和 [16-6] 上的反印文和編繩殘跡，探討它們的疊壓和存放形態，繼而重新檢討三牘的文書構成和傳遞方式，回應目前研究

⁷ 參邢義田，〈湖南龍山里耶 J1(8)157 和 J1(9)1-12 號秦牘的文書構成、筆跡和原檔存放形式〉，頁 473-498；黎明釗、馬增榮，〈試論里耶秦牘與秦代文書學的幾個問題〉，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主編，《簡帛》第 5 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頁 73-75；初山明，〈簡牘文書學與法制史——以里耶秦簡為例〉，柳立言主編，《史料與法史學》（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6），頁 47；張忠煒，〈里耶秦簡博物館藏秦簡概說〉，頁 12-15；姚磊，〈里耶秦簡第 9 層 1-12 號木牘的反印文及其疊壓關係〉，《中國文字》新 43 (2017)：145-165。

⁸ 參姚磊，〈里耶秦簡第 9 層 1-12 號木牘的反印文及其疊壓關係〉，頁 165。

⁹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里耶秦簡（貳）》（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頁 242。本文引用 9-2283 號牘圖版皆據此書。

¹⁰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八日，筆者完成本文部分內容後，承唐俊峰告知，他於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到訪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時，曾請庫房人員取出 [16-7]，但獲告知庫房已沒有登記為該出土號的木牘。庫房人員推測 [16-7] 可能後來修改了編號。就此事，筆者特別去信張春龍求證。張先生於翌日的回覆中，確認新公布的 9-2283 就是出土號 [16-7] 的木牘。就此，特別向兩位致謝。

中未解的難題。結論認為，這三件內容獨立的木牘，在編聯後曾以「折頁」的方式疊在一起作存檔用。三件木牘均曾按「以道次傳別書」的方式傳送至遷陵縣，但由於洞庭郡守禮初次下發文書時，沒有指明行書路線和下令屬縣相報書回覆，因此[16-6]和[16-5]兩牘先後重複從鄰縣傳抄至遷陵縣。載有洞庭郡守禮追加補充內容的 9-2283 牘則是三件木牘中最後抵達遷陵縣的。結合三牘的疊壓次序分析，本文指出冊書的編聯次序與三牘抵達遷陵縣的次序相反，最晚抵達的放在冊書之首，最早的放在冊書之末。疊起存放時，最晚收到和處理的 9-2283 牘剛好朝上。以上發現或可讓我們重新反思目前秦代文書形態的諸多問題。¹¹

二・9-2283、[16-5]和[16-6]三牘的疊壓關係與存放形態

邢義田最早據著名的 9-1 至 9-12 號木牘上的反印文，討論十二件木牘之間的疊壓關係和文書構成，引起了學者對里耶秦簡中反印文的關注。¹² 然而，由於材料有限，相關討論僅局限於 9-1 至 9-12 號木牘。直至二〇一六年，張忠煒在重新整理里耶博物館藏秦簡時，留意到 [16-5] 背面亦有反印文「貳春皆勿」和「尉別」，但認為它們未能與 [16-6] 上的文字對應，因此未對兩者的疊壓關係發表意見。¹³ 同時，陶安 (Arnd Helmut Hafner) 亦注意到 [16-5] 背面的反印文，並懷疑是來自 [16-6] 的。然而，張馳已指出 [16-5] 背面的反印文未能與 [16-6] 背面的原文對應。¹⁴ 因為 9-2283 的公布，我們在這個問題上獲得了新的突破。經小心比對，不但 9-2283 與 [16-5] 兩牘背面的部分文字和反印文能完美地對應起來，仔細留意 [16-5] 和 [16-6] 兩牘正面的反印文和原來文字，可以肯定兩者曾疊在一起。配合三牘上的編繩殘跡，我們可以據此推測三牘當時的存放狀態。

¹¹ 這三牘透露的訊息十分豐富，特別是其中所載的秦令和洞庭守禮的指示，對了解秦帝國人力資源的管理方法有重要的參考價值。由於《里耶秦簡（貳）》的出版，我們可以據新材料重新檢討該條秦令中關於徵發各類人力資源優先次序的規定。然而，這已超出本文的討論範圍，只能另外撰文探討。關於秦帝國人力資源的管理策略，初步的討論可參 Tsang Wing Ma, "Qin Management of Human Resources in Light of an Administrative Document from Liye, Hunan Provinc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9th Annual Southeast Early China Roundtabl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Knoxville, October 30-November 1, 2015.

¹² 參前注 7 引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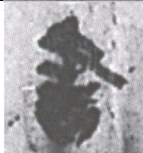
¹³ 張忠煒，〈里耶秦簡博物館藏秦簡概說〉，頁 15。

¹⁴ 陶安的論點，轉述自張馳，〈《里耶秦簡（壹）》文書學研究〉（武漢：武漢大學歷史學院碩士論文，2016），頁 227。





（一）反印文¹⁵

首先，比對[16-5]背面和 9-2283 背面，有幾處的反印文和原來文字可以對應起來。為方便與原文比較，以下反印文的照片皆水平翻轉（表一至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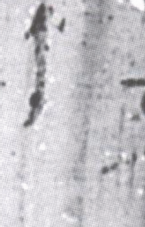

表一：[16-5] 背面反印文和 9-2283 背面原文對照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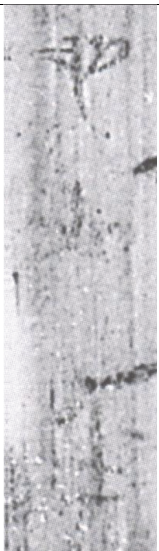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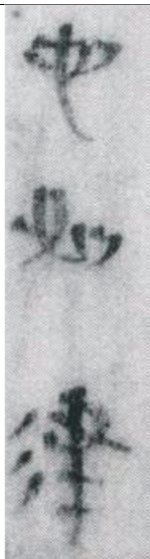
	[16-5] 背面反印文	9-2283 背面原文
貳 春 皆 勿 留		
書		

¹⁵ 初步的討論，參馬增榮，〈里耶秦簡 9-2283、[16-5]和[16-6]三牘的反印文和疊壓關係〉，簡帛網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3209，2018.08.22，讀取 2019.05.17)。

	[16-5] 背面反印文	9-2283 背面原文
鄉		
尉別書		

表二：9-2283 背面反印文和[16-5] 背面原文對照表

	9-2283 背面反印文	[16-5] 背面原文
刻隸		
傳		

	9-2283 背面反印文	[16-5] 背面原文
它 如 律		

[16-5] 背面留空部分的反印文「貳春皆勿留」和「書」，以及第四行的反印文「鄉」和「尉別書」可與 9-2283 背面第二、三行的原文完美地對應起來（表一）。¹⁶ 9-2283 背面第四行的反印文「刻隸」二字、¹⁷ 留空部分的「傳」字偏旁「亻」，以及「它如律」三字則可以與 [16-5] 背面第二、三行的原文對應（表二）。由此可知，[16-5] 背面和 9-2283 背面原來是疊在一起。

[16-6] 與[16-5] 和 9-2283 的關係又如何？仔細留意，[16-6] 正面第六行「縣＝亟以律令具論」和第七行「尉令人日夜端行它」之間實有反印文「調縣嗇夫卒史嘉段」八字。¹⁸ 由於這一段文字均見於此三件木牘正面的第一行，只要比對其餘兩牘的原文，即可知道它們的疊壓關係。結果發現，[16-6] 正面第七行反印文「調縣嗇夫卒史嘉段」與[16-5] 正面第一行原文可完整對應起來（表三）。如果按此方法疊在一起，兩件木牘並不是完全上下對齊的，[16-6] 的頂部應稍微突出。循此方向觀察，[16-6] 正面下半部第一、二行之間還有反印文「泰」字，應可與[16-6] 正面第六行的「泰」字對應（表四）。

¹⁶ 關於三牘的分行，參圖一以及下文所引三牘的釋文。



¹⁷ 「刻隸」二字的辨認，參考了唐俊峰的意見，謹謝。

¹⁸ 「調」字之上有一殘劃，但並不確定這是否「禮」字的反印文。

表三：[16-6] 正面反印文與[16-5] 正面和 9-2283 正面原文對照表

	[16-6] 正面反印文	[16-5] 正面原文	9-2283 正面原文
謂縣嗇夫卒史嘉段			

表四：[16-6] 正面反印文和[16-5] 正面原文對照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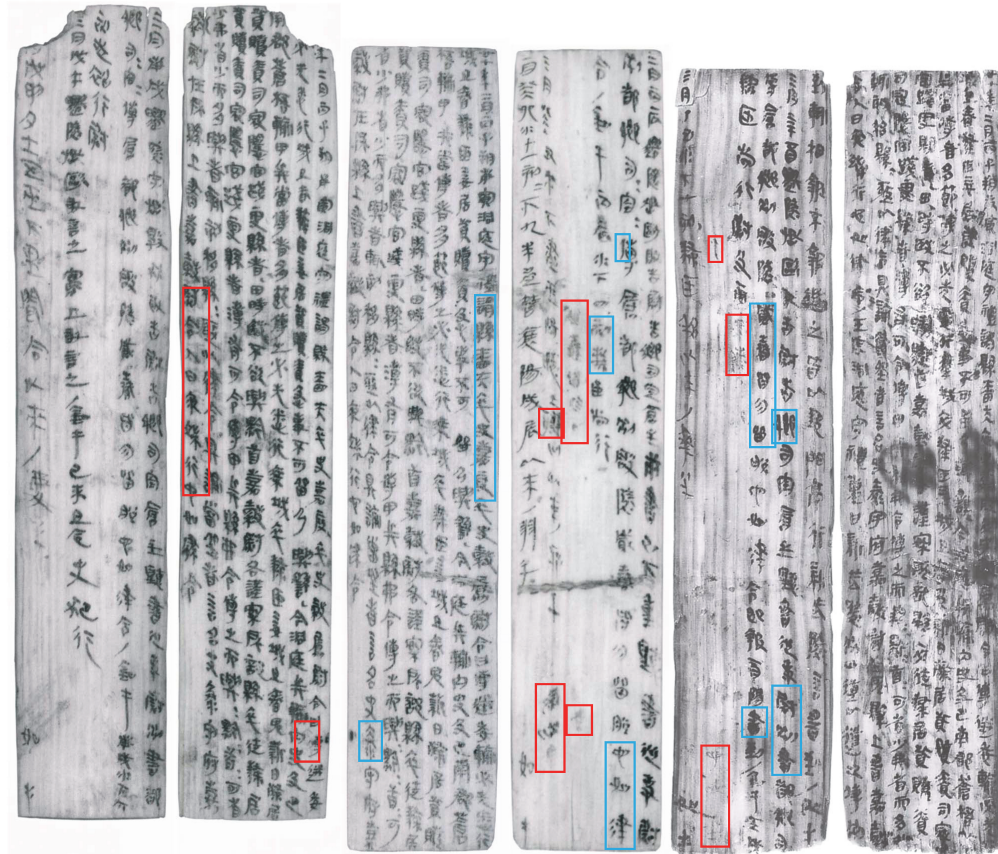
	[16-6] 正面反印文	[16-5] 正面原文
泰		

根據以上的比對結果，此三牘的疊壓關係應如下（箭嘴指示印有墨痕的一方）：

正 9-2283 背 \longleftrightarrow 背[16-5] 正 \longrightarrow 正[16-6] 背

三件木牘的反印文和原來文字位置的對應情況，可參考圖一。由於 9-2283 牘下部有殘損，加上[16-5] 和[16-6] 位置不是完全對應，三者並非上下對齊。這極有可能是由於編繩腐爛，加上於井下遭外物擠壓，導致木牘出現移位的情況。反印文當是在木牘移位後於井下潮濕環境形成。¹⁹ 此外，這三件木牘並非朝同一方向疊放，既有背面對背面（9-2283 背面和[16-5] 背面），亦有正面對正面（[16-5] 正面和[16-6] 正面）的情況；而且朝外的[16-6] 背面和 9-2283 正面均未見反印文，反而留有由某些堅硬物質造成的「強度壓痕」（張春龍語，詳下文）。為何如此？這透露了什麼訊息？以下將配合三牘上的編繩殘跡分析，並藉此推測三者原來的存放形態。

¹⁹ 關於古井出土簡牘的反印文形成於何時的問題，目前有廢棄入井前和入井後兩家的說法。然而，考慮 9-2283、[16-5] 和 [16-6] 三牘的反印文均是木牘於井下移位後才形成，當以後一說為是。相關的討論，參安部聰一郎，〈試論走馬樓吳簡所見名籍之體式〉，長沙簡牘博物館、北京吳簡研討班編，《吳簡研究》第 2 輯（武漢：崇文書局，2006），頁 16-18；邢義田，〈湖南龍山里耶 J1(8)157 和 J1(9)1-12 號秦牘的文書構成、筆跡和原檔存放形式〉，頁 481；張忠偉，〈里耶秦簡博物館藏秦簡概說〉，頁 15；姚磊，〈里耶秦簡第 9 層 1-12 號木牘的反印文及其疊壓關係〉，頁 164-165。



[16-6] 背 [16-6] 正 [16-5] 正 [16-5] 背 9-2283 背 9-2283 正

圖一：9-2283、[16-5] 和 [16-6] 三牘正背面反印文和原文位置對照圖
(分別用紅色框和藍色框表示)

(二) 編繩殘跡

關於里耶秦簡中的編聯情況，發掘者曾這樣說：

一般兩道編繩，木牘多不編聯，一枚木牘之上文字即是完整文書。²⁰

這種「一枚木牘之上文字即是完整文書」，即是日本學者角谷常子所論的「單獨簡」。²¹ 她引用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司空》的條文，指出這些一般書寫三

²⁰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里耶秦簡（壹）》（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頁1。

²¹ 角谷常子所指的「單獨簡」是「一枚內容已經寫完、不需編綴成冊的簡牘」。參角谷常

行以上的「單獨簡」，「不是『編』而是『纏』」，也就是說不編綴，而是把文書捆綁起來」。²² 該條文規定：

令縣及都官取柳及木檠（柔）可用書者，方之以書；毋（無）方者乃用版。其縣山之多莽者，以莽纏書；毋（無）莽者以蒲、蘭以泉蓊（繫）之。各以其檣（獲）時多積之。²³

李學勤最早引用湖北荊州高臺 18 號墓出土四方木牘的存放情況，指出里耶秦簡 9-1 至 9-12 號木牘或曾捆紮一起。初山明後又根據這十二件木牘的疊壓關係，以及謝家橋 1 號墓簡牘的出土情況，²⁴ 推論上引睡虎地秦律中所謂「纏書」的捆紮方法就是里耶秦簡中的「束」。他認為，里耶秦簡中削成梯級狀並書有「束」字的標題簡可能與這些正、背面均書寫文字的木牘捆紮一起，目的是防止繩子鬆脫。²⁵ 德國學者史達進一步推展角谷和初山兩位學者的說法，並引用睡虎地 77 號墓和松柏 1 號墓等地的考古報告，提出「束」可視為編綴成冊以外，另一種收藏簡牘的方式。²⁶ 那麼 9-2283、[16-5] 和 [16-6] 三牘又是以何種方式收藏？這三件木牘按角谷先生的定義，絕對可視為「單獨簡」。如果據上述的研究，它們或

子，〈里耶秦簡における単独簡について〉，《奈良史学》30 (2013): 107；中譯據角谷常子，〈論里耶秦簡的單獨簡〉，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主編，《簡帛》第 8 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頁 161。「單獨簡」和「編綴簡」在日本的簡牘研究中是經常用到的分類概念。關於「單獨簡」在西北漢簡中的情況，參富谷至編，《漢簡語彙考証》（東京：岩波書店，2015），頁 19-22。最近，史達 (Thies Staack) 根據嶽麓秦簡中的法律規定，就「單獨簡」和「編綴簡」這一對分類概念作了進一步的發揮。參 Thies Staack, "Single- and Multi-Piece Manuscripts in Early Imperial China: On the Background and Significance of a Terminological Distinction," *Early China* 51 (2018): 1-51。

²² 角谷常子，〈論里耶秦簡的單獨簡〉，頁 175。

²³ 陳偉主編，《秦簡牘合集·壹》（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4），頁 120。

²⁴ 整理者原來的描述是：「簡、牘卷合後於兩端各綁 2 道蒲草，外包蒲草後，在中部綁 4 道蒲草，在兩邊各綁 1 道蒲草，蒲草在端頭扭合。」見荊州博物館，〈湖北荊州謝家橋一號漢墓發掘簡報〉，《文物》2009.4: 41。黃浩波最近提出，這種捆綁方式即是漢簡中所載的「蒲封」，參黃浩波，〈蒲封：秦漢時期簡牘文書的一種封緘方式〉，《考古》2019.10: 98-105。

²⁵ 初山明，〈簡牘文書學與法制史〉，頁 47-49。關於這些書有「束」字的梯狀標題簡，參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里耶一號井的封檢和束〉，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湖南考古輯刊》8（長沙：嶽麓書社，2009），頁 65-70。

²⁶ Staack, "Single- and Multi-Piece Manuscripts in Early Imperial China," pp. 19-23.

許最適合以「束」的方式捆紮起來。然而，參合三牘上的編繩痕跡和上一節論證的疊壓次序，本文以為它們不可能以「束」的方式從外圍捆紮在一起。²⁷

試觀圖版，夾在 9-2283 和[16-6]兩牘中間的[16-5]牘，其正、背兩面均有明顯的編繩痕跡，背面第二道編繩位置至今仍留有編繩殘餘物（圖二，右）。因此，三牘不可能僅從外圍捆紮，位於中間的[16-5]在三牘疊起收藏時必定有編繩拴繫。再看其餘兩牘，9-2283 背面也有明顯的編繩痕跡。²⁸ 值得留意，該牘背面第二道編繩位置有兩個繩印，靠上一個可與[16-5]背面上的編繩殘餘物對應，應是兩牘相疊時印過來的，靠下一個很可能是 9-2283 原來編繩留下的痕跡（圖二）。[16-6]正面的編繩痕跡並不明顯，但觀察彩色圖版，第一道編繩束緊的痕跡仍隱約可見（圖三）。²⁹ 三牘疊起後，朝外的[16-6]背面和 9-2283 正面均未能觀察到編繩痕跡，但卻有因某些硬物造成的「強度壓痕」（表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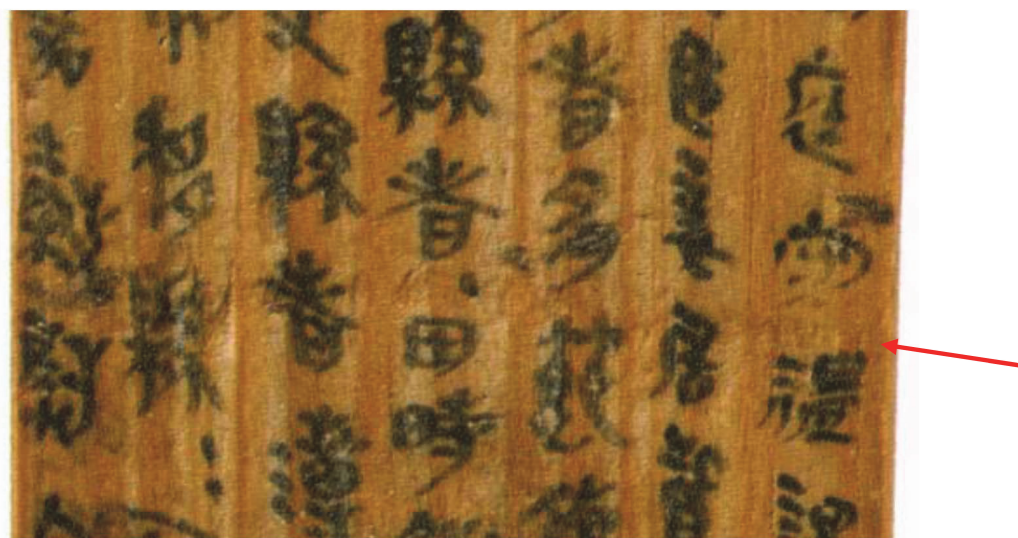
²⁷ 關於「束」，還可以補充兩條資料。第一，長沙尚德街 482 號井出土的 85 號木牘載有「上事奏卅五束」、「穀奏廿九束」等內容。我們固然可以藉此推論，「束」為「篇」和「卷」以外，另一種古書／文書的數量單位；然而，另一種可能解釋是，這裏的「束」指書寫特定種類文書所需原材料的數量單位。同牘所載的「上事囊」和「上事繩」可能也是上書言事時需要用到的特定材料。該牘見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長沙尚德街東漢簡牘》（長沙：嶽麓書社，2016），頁 227-228。整理者把該牘歸類為「雜帳」。第二，最近謝坤集成了一組自題為「鼠券束」的文書。標題簡背面下端殘留「敢言司空」四字。這些捕鼠紀錄均是用狹長的木簡一行書寫，不但圖版未見刻齒，整理者在釋文中也沒有提及（按例，凡簡牘側面有刻齒者，整理者均會在釋文中注出）。除了自題為「束」這一點外，從物質形態的角度考慮，這批紀錄似乎亦可以用「編」的方式收納存放。這組文書見謝坤，〈《里耶秦簡（貳）》札記（一）〉，簡帛網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3108，2018.05.17，讀取 2019.01.02)。類似的捕鼠紀錄又見於南越國宮署出土木簡，似為考課用。弄清這批紀錄的性質也許有助判斷它們的收藏方式。南越木簡中的捕鼠紀錄，參黃展岳，〈南越木簡選釋〉，氏著，《先秦兩漢考古論叢》（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頁 446-455，簡 105、107 和 110。券書以「編」的方式收藏，最佳例子是新近公布的睡虎地 77 號墓出土券書。參陳偉、熊北生，〈睡虎地漢簡中的券與相關文書〉，《文物》2019.12：53-62。

²⁸ 二〇一五年九月七至八日，筆者於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目驗 9-2283 原牘，兩道編痕清晰可見。此外，正面第一道編繩位置右側有一向左凹入的壓痕，似是由於編繩束緊造成，但《里耶秦簡（貳）》中的黑白圖片卻未見此凹痕。為何如此？仍然待查。

²⁹ [16-6]正面第一行「庭」和「守」兩字之間的殘跡，筆者初看紅外線圖，以為是編繩痕跡，但再看彩色圖版並且比較其餘兩牘上的編痕後，這更似是墨跡。觀察彩圖，從第一行「守」、「禮」二字之間，一直到第五行的「者」字，可隱約見到一道連續的壓痕，應該是因編繩束緊而留下來的痕跡。[16-6]正面與[16-5]正面疊壓，因此不可能是由其他外物造成的痕跡。












圖二：9-2283 背面（左）和 [16-5] 背面（右）第二道編繩痕跡
（紅色箭嘴指示 9-2283 牘上兩個繩印）



圖三：[16-6] 牘正面第一道編繩痕跡
（紅色箭嘴指示編繩走向）

表五：[16-6] 背面和 9-2283 正面上的壓痕

[16-6] 背面		9-2283 正面
		
		
		

關於這些壓痕，筆者曾懷疑它們是由某些物質（如上引睡虎地秦律中的莽、蒲、蘭和泉等）隨意捆紮形成的痕跡，似乎可佐證以上諸位學者的推論，遂以此徵詢發掘者張春龍的意見。張先生於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七日電郵回覆道：「編繩不可能造成如此強度壓痕」，這些壓痕「多為陶瓦石塊等硬度大的物質相鄰，井下高壓所致」。張先生掌握第一手的考古訊息，其意見具重要參考價值；更重要的是，排除這些壓痕為捆紮痕跡後，反而豁然開朗。本文以為，[16-6]背面和 9-2283 正面由於處於三牘的外圍，編繩極可能於井中潮濕的環境下，經長年累月的腐蝕而消失殆盡；反而夾在兩牘中間的[16-5]牘，其正、背兩面因有[16-6]和 9-2283 兩牘的保護，編繩橫過的痕跡至今仍然清晰可辨，且有殘餘物遺存。而疊

在這兩面上的 9-2283 背面和[16-6]正面，部分編繩痕跡亦得以殘存。³⁰ 出於同一原因，三牘中只有位於中間的[16-5]牘仍完整，朝外的 9-2283 和[16-6]兩牘都有不同程度的殘損。³¹

如果以上的推論不誤，三件木牘曾經編聯在一起的話，為何它們會分別以背面對背面（9-2283 背面和[16-5]背面）和正面對正面（[16-5]正面和[16-6]正面）的方式疊在一起？本文以為，較合理的解釋是，這三件編聯在一起的木牘或曾以「折頁」的方式折疊起來。圖四是筆者手繪的構想圖。為驗證此構想的可行性，筆者特地從網上訂購木材和麻繩進行復原（圖五）。³² 這三件木牘的長、寬度相當一致，顯然是經過挑選的結果（長約 22 公分、寬約 4 公分）。³³ 它們原來應該是從右至左，按 9-2283、[16-5]、[16-6]的順序，正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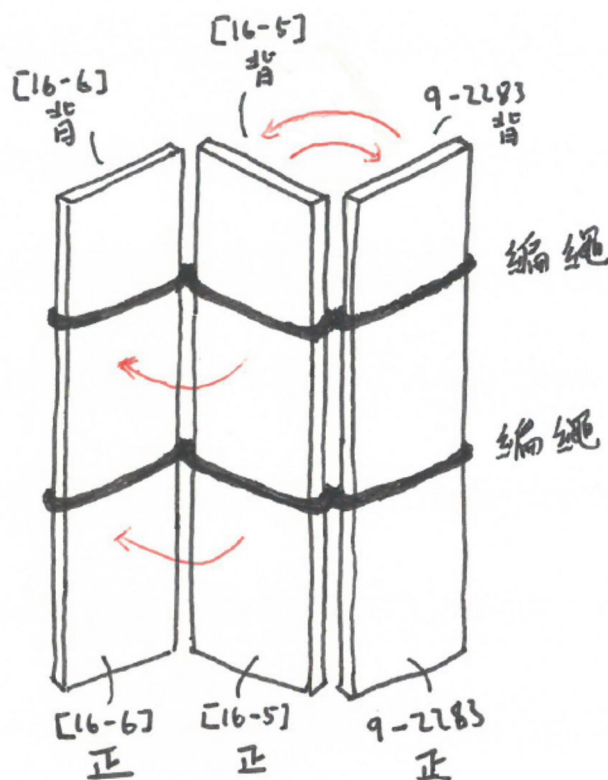
³⁰ 西北漢簡由於環境乾燥，偶有編繩能完好地保存下來的例子，如著名的「永元器物簿」。南方古井出土簡牘則因為井下潮濕的環境，編繩能完整保存下來的相當稀少。例如，可確認曾編在一起的 8-755、8-756、8-757、8-758、8-759 和 8-1523 六簡，編繩已腐朽，並且幾乎不見編痕，但文字卻保存得非常完整。關於該冊書的最新研究，參宮宅潔，〈關於里耶秦簡 8-755~759 簡與 8-1564 簡的編聯〉，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主編，《簡帛》第 18 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頁 29-36。又，侯旭東搜羅了目前已公布的西北漢簡中附有編繩的例子，共有 11 件。參侯旭東，〈西北出土漢代文書簡冊的排列與復原〉，《簡帛》第 18 輯，頁 120-122。

³¹ 9-2283 牘下部有殘損，[16-6]牘則缺了左上角。由於三牘在井中受壓出現移動，三牘未能按原來收藏的方式，上下對齊疊放。9-2283 和[16-6]兩牘殘缺的地方均是發生移位後突出的部分，參圖一。

³² 三件木牘的具體編法為何？本文仍未有結論，圖五暫依西北漢簡常見的編法復原。並參侯旭東，〈西北出土漢代文書簡冊的排列與復原〉，頁 122-123 中的描述。走馬樓吳簡和北京大學藏秦簡的整理小組均曾嘗試復原竹簡的編法，或可比較。據研究，走馬樓吳簡是成「8」字形交錯編聯，與西北漢簡類似，北大秦簡則是以「鎖子扣方式」編聯。參蕭靜華，〈從實物所見三國吳簡的製作方法〉，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長沙三國吳簡暨百年來簡帛發現與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26-27；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北京大學藏秦簡牘室內發掘清理簡報〉，《文物》2012.6：37, 41 圖廿五。

³³ 根據《里耶秦簡博物館藏秦簡》（頁 161）一書，[16-5]和[16-6]兩牘分別長 22.8 公分、寬 4.2 公分和長 22.8 公分、寬 4.4 公分。《里耶秦簡（貳）》的「凡例」（頁 1）稱該書圖版據簡牘原大影印。筆者據該書所刊圖版量度的結果顯示，9-2283 牘長 22.4 公分、寬 4.6 公分。9-2283 下部有殘損，較其餘兩牘短 0.4 公分，可以理解。三牘寬度相差在 0.4 公分之內，差異甚微。關於三牘的厚度，目前我們只有[16-5]一牘的數據。據《里耶秦簡博物館藏秦簡》（頁 161）一書，[16-5]牘厚 0.3 公分。圖五中三牘尺寸主要依照以上數據復原，惟 9-2283 一牘因下部殘損，其長度調整為 22.8 公分；三牘厚度則按[16-5]，假設皆為 0.3 公分。

朝上編聯起來（圖五-1）。由於編繩痕跡壓過部分文字，它們是先寫後編的。³⁴三件木牘較寬，所以採折疊方式收納，而非按最常看到的往同一方向卷起來。收藏時，9-2283 背面往[16-5]背面對折（圖五-2），[16-5]正面往[16-6]正面對折（圖五-3）。三牘疊起後，9-2283 正面朝上，[16-6]背面朝下（圖五-4）。這個說法可以完滿解釋兩個重要問題：第一，為何三牘上均留有編痕，特別是夾在中間的[16-5]牘；第二，為何三牘上反印文顯示的疊壓關係為：「正9-2283 背 \longleftrightarrow 背[16-5]正 \longrightarrow 正[16-6]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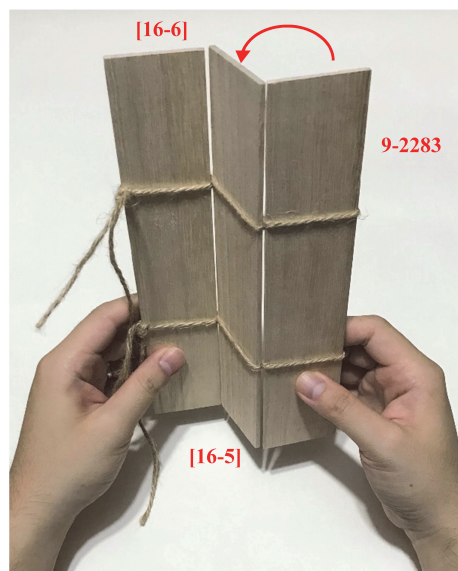


圖四：9-2283、[16-5] 和[16-6] 三牘「折頁」收納的構想圖
（紅色箭嘴指示印有墨痕的一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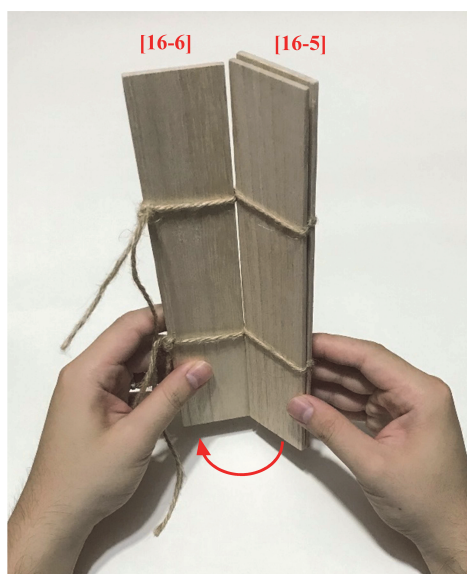
³⁴ 如[16-5] 正面第一行的「禮」和「屬」字、第二行的「責」和「洞」字，以及第三行的「妾」字上均有編繩蓋過的痕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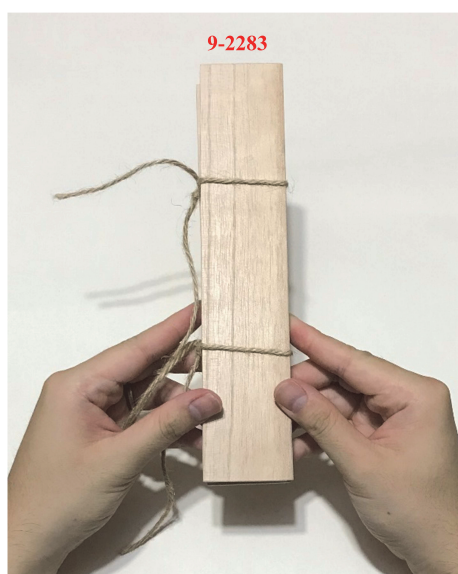
1. 三牘從右至左，按 9-2283、[16-5]、[16-6] 的順序，正面朝上編聯



2. 9-2283 背面往 [16-5] 背面對折



3. [16-5] 正面往 [16-6] 正面對折



4. 三牘對折疊起後，9-2283 正面朝上，[16-6] 背面朝下

圖五：9-2283、[16-5] 和 [16-6] 三牘「折頁」收納的復原圖

對於這種收納方式，已故的錢存訓先生早有提示。他於《書於竹帛：中國古代的文字紀錄》一書中說：

古書的藏置，可能有兩種不同形式：一為數簡編成後卷成一捆；另一為折頁形，每冊簡面相對，有如現今書籍的冊頁形式。³⁵

錢先生雖未舉出具體例子，但這種藏置形式並非純屬想像。例如，馮勝君觀察《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一書所附的「竹簡出土位置示意圖」，便指出該墓出土的《引書》，至少有部分簡是以「折頁」的方式存放。³⁶ 最近，肖芸曉更論證，清華大學所藏的《算表》正是用折疊的方式收卷。³⁷ 她又引信陽楚墓整理者的意見，指出該墓出土的第二組簡可能也是以相同的方式收卷。³⁸ 其後，賈連翔又指出清華簡《殷高宗問三壽》同樣是對折收卷。³⁹ 然而，這些眾多的例子均是由狹長的竹簡組成，內容亦可以連讀。與此不同，本文所論的9-2283、[16-5]和[16-6]三牘，均是較寬的木牘，而且內容上可各自獨立看待，符合日本學者「單獨簡」的定義。⁴⁰ 這三件木牘編聯後以「折頁」方式收納，在目前已公布的秦漢行政文書中，屬首個可以論證的例子。⁴¹

³⁵ 錢存訓，《書於竹帛：中國古代的文字紀錄》（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頁79。英文原文更為生動貼切：“The books were probably bound in two different forms. One was the roll form after the tablets were connected with a cord. Another was the **accordion form** in which the tablets were placed face to face in a *ce*, from which the modern volume is derived.” 簡冊折疊起來，猶如手風琴。Tsuen-hsuei Tsien, *Written on Bamboo & Silk: The Beginnings of Chinese Books & Inscrip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 p. 123.

³⁶ 馮勝君，〈從出土文獻談先秦兩漢古書的體例（文本書寫篇）〉，《文史》2004.4：33 注65。

³⁷ 肖芸曉，〈清華簡《算表》首簡簡序及收卷形式小議〉，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主編，《簡帛》第10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頁67-77。又參肖芸曉，〈清華簡收捲研究舉例〉，李學勤主編，《出土文獻》第7輯（上海：中西書局，2015），頁172-186。

³⁸ 整理者原來的描述是：「部分竹簡編聯是每四根為一束，兩兩相對，字面朝裏。」見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信陽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頁68。

³⁹ 賈連翔，〈反印墨跡與竹書編連的再認識〉，李學勤主編，《出土文獻》第6輯（上海：中西書局，2015），頁239。

⁴⁰ 由此反思，我們似乎不宜預設「單獨簡」和「編綴簡」這兩個分類概念，可以完整地套用於所有簡牘的分析之上。牘面寬闊且內容獨立的木牘，也可以用「編」的方法收藏。類此反思，亦見陶安あんど，〈書写材料とモノの狭間—日本木簡学との比較を通じてみた中国簡牘学のジレンマ—〉，初山明、佐藤信編，《文献と遺物の境界：中国出土簡牘史料の生態的研究》（東京：六一書房，2011），頁276, 278 注15。據學者推測，走馬樓出土

三・9-2283、[16-5]和[16-6]三牘的文書構成和傳遞方式

簡牘的物質形態分析和文字研讀並非毫無關係的兩個獨立領域。反之，本文關於 9-2283、[16-5]和[16-6]三牘文字內容的分析，即是建基於上文關於三牘的物質形態的結論。根據上文的分析，至少有兩點在討論三牘的文字前可以確認：第一，由於朝外的 9-2283 正面和[16-6]背面均沒有反印文，反而殘存於井下受其他堆積物擠壓造成的痕跡，我們可以推論這一份冊書——至少廢棄入井前一刻——僅有此三牘。第二，三牘的文字內容雖然相關，但可各自單獨看待。冊書先寫後編；編聯後，三牘的文字不能順序從右至左連讀，顯然僅為存檔留底用。

在 9-2283 牘公布之前，特別吸引學者的問題是：為何[16-5]和[16-6]的正面重複了同樣的內容？為何[16-5]背面載有兩個收文紀錄？它們究竟如何製作和傳遞，又是出於何種目的保存下來？根據鷹取祐司的分析，[16-6]和[16-5]這兩件木牘應是分別從洞庭郡直接傳遞和從洞庭郡「以道次傳別書」的方式傳遞。鷹取祐司稱後一種傳遞方式為日語中的「回覽板方式」，文書從洞庭郡按所路經的縣順序傳遞。⁴² 與此相類，藤田勝久、呂靜和初山明均認為[16-5]背面兩個收文紀錄反映該牘是從洞庭郡經由他縣送來。由於對牘文的解讀不同，藤田勝久和呂靜認為該牘是由陽陵縣送來，初山明則以為是經巫縣傳達。⁴³ 與此不同，楊振

孫吳簡牘中更有狹長竹簡和寬大木牘混編的情況。簡牘實際的編聯方式似比我們過去想像的更為複雜。參伊藤敏雄，〈長沙吳簡中の「叩頭死罪白」文書木牘小考—文書木牘と竹簡との編綴を中心に—〉，《歷史研究》51(2013)：29-48；凌文超，〈走馬樓吳簡採集簿書整理與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頁 461。

⁴¹ 簡牘編聯後，以「折頁」方式疊起收藏，在秦漢時代也許並非異常罕見。過去學者習慣以帛書收卷的情況比擬簡牘冊書卷起的形態。應當注意，出土帛書，既有卷成一軸的，也有折疊成塊的。參李零，〈《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北京：三聯書店，2008，修訂本），頁 141；陳劍，〈馬王堆帛書的「印文」、空白頁和襯頁及折疊情況綜述〉，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 (<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4202>，2018.01.01，讀取 2019.01.02)。

⁴² 鷹取祐司，〈《秦漢官文書の基礎的研究》〉，頁 243-270，特別是頁 269 注 33。

⁴³ 藤田勝久，〈《中国古代国家と社会システム》〉，頁 160；呂靜，〈秦代における行政文書の管理に関する考察〉，頁 267；初山明，〈秦漢出土文字史料の研究〉，頁 151。唐俊峰謂[16-5]背面第一個收文紀錄為遷陵縣前一站的收文紀錄，也是從同一思路出發。參唐俊峰，〈秦代遷陵縣行政信息傳遞效率初探〉，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主編，〈《簡帛》第 16 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頁 206 注 1。

紅和單印飛則進一步發展陳劍之說，認為[16-6]是從洞庭郡直接送往遷陵縣，[16-5]是經由卒史嘉、假卒史穀和屬尉的治所轉發到遷陵縣。⁴⁴ 更有意見認為，[16-5]牘所載洞庭郡的指示曾兩度抵達遷陵縣，只是第一次到達後，由於「某種原因」，尚未批覆已「流轉」他處。⁴⁵ 自 9-2283 公布後，雖然提供了更多的線索，但這些問題似乎變得更加複雜了。

為方便討論，以下先把三牘的釋文列出。9-2283 號木牘的釋文是以《里耶秦簡（貳）》的釋文和圖版為底本，參考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二卷）》訂定；⁴⁶ [16-5] 和 [16-6] 號木牘的釋文則是以《里耶秦簡博物館藏秦簡》的釋文和圖版為底本，並參考馬怡的《里耶秦簡選校》，斟酌訂定：⁴⁷

9-2283 正

[第一行] [1] ⁴⁸ 廿七年二月丙子朔庚寅（十五日），洞庭守禮謂縣嗇夫、卒史嘉、假（假）卒史穀、屬尉：令曰：「傳送委輸，必先【悉行】

[第二行] 城旦舂、隸臣妾、居貲贖責（債），急事不可留，乃興繇（徭）
𠂔。」今洞庭兵輸內史及巴、南郡、蒼梧。【輸甲】

[第三行] 兵當傳者多節（即）傳之。必先悉行乘城卒、隸臣妾、城旦舂、
鬼薪白粲、居貲贖責（債）、司寇、【隱】

[第四行] 官、踐更縣者 𠂔。田時毆（也），不欲興黔首。嘉、穀、尉各謹
案所部縣卒、徒隸、居貲贖責（債）、

[第五行] 司寇、隱官、踐更縣者簿，有可令傳甲兵，縣弗令傳之而興=黔
=首=，（興黔首）可省少弗省而多興【者】，

[第六行] 輒劾移縣=，（縣）亟以律令具論當坐者，言名央（決）泰守
府。嘉、穀、尉在所縣上書嘉、穀、【尉】。

⁴⁴ 陳劍，〈讀秦漢簡札記三篇〉，頁 374 注 1；楊振紅、單印飛，〈里耶秦簡 J1(16)5、J1(16)6 的釋讀與文書的製作、傳遞〉，頁 22-23。

⁴⁵ 單育辰，〈里耶秦公文流轉研究〉，頁 208-209。

⁴⁶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二卷）》（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8）。如非特別說明，本文所引里耶古井第九層簡牘的釋文和綴合，皆據此書。第八層簡牘的釋文和綴合，則據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2）。

⁴⁷ 馬怡，〈里耶秦簡選校〉，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編委會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第 4 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頁 143-151。

⁴⁸ [] 內的序號是本文按三牘上各項紀錄的日期先後所作的排序，參表八及九。

[第七行] 令人日夜端行，它如律令。 / [2] 壬辰（二月十七日），洞庭守禮重曰：新武陵別四道，以道次傳別【書＝。（書）】

9-2283 背

[第一行] 到，輒相報；不報，追之。皆以郵、門亭行。新武陵言書到。 / 如手。

[第二行] [13] 三月辛酉（十六日），遷陵丞歐敢告尉：告鄉、司空、倉主，聽書從事。尉別書都鄉、司【空＝】，（司空）

[第三行] 傳倉；都鄉別啓陵、貳春，皆勿留脫。它如律令。即報酉陽書到。 / 鈞手。 [14] 壬戌（三月十七日），

[第四行] 隸臣尚行尉及旁。

[留 空]

[第五行] [10] 三月丁巳（十二日）水下七刻，隸臣移以來。 / 爽半。
[1] 如手。

[16-5] 正

[第一行] [1] 廿七年二月丙子朔庚寅（十五日），洞庭守禮謂縣嗇夫、卒史嘉、段（假）卒史穀、屬尉：令曰：「傳送委輸，必先悉行

[第二行] 城旦舂、隸臣妾、居貲贖責（債），急事不可留，乃興繇（徭）
^L。」今洞庭兵輸內史及巴、南郡、蒼

[第三行] 梧，輸甲兵當傳者多節（即）傳之。必先悉行乘城卒、隸臣妾、城旦舂、鬼薪白粲、居貲贖

[第四行] 責（債）、司寇、隱官、踐更縣者^L。田時毆（也），不欲興黔首。嘉、穀、尉各謹案所部縣卒、徒隸、居

[第五行] 貲贖責（債）、司寇、隱官、踐更縣者簿，有可令傳甲兵，縣弗令傳之而興＝黔＝首＝，（興黔首）可

[第六行] 省少弗省少而多興者，輒劾移縣＝，（縣）亟以律令具論當坐者，言名決（決）泰守府。嘉、

[第七行] 穀、尉在所縣上書嘉、穀、尉。令人日夜端行，它如律令。

[16-5] 背

[第一行] [8] 三月丙辰（十一日），遷陵丞歐敢告尉：告鄉、司空、倉主，前書已下，重聽書從事。尉

[第二行] 別都鄉、司＝空＝，（司空）傳倉；都鄉別啓陵、貳春，皆勿留脫。它如律

[第三行] 令。／鈎手。〔9〕丙辰（三月十一日）水下四刻，隸臣尚行。

[留 空]

[第四行] 〔7〕三月癸丑（八日）水下盡，巫⁴⁹ 陽陵士【伍】⁵⁰ 句以來。／邪半。

[第五行] 〔3〕【二】月癸卯（廿八日）水十一刻＝（刻）下九，求盜簪裏陽成辰以來。／弱半。〔1〕如手。

[16-6] 正

[第一行] 〔1〕【廿七】年二月丙子朔庚寅（十五日），洞庭守禮謂縣嗇夫、卒史嘉、段（假）卒史穀、屬尉：令曰：「傳送委

[第二行] 【輸】，必先悉行城旦舂、隸臣妾、居貲贖責（債），急事不可留，乃興繇（徭）[┐]。」今洞庭兵輸內史及巴、

[第三行] 南郡、蒼梧，輸甲兵當傳者多節（即）傳之。必先悉行乘城卒、隸臣妾、城旦舂、鬼薪白粲、居

[第四行] 貲贖責（債）、司寇、隱官、踐更縣者[┐]。田時毆（也），不欲興黔首。嘉、穀、尉各謹案所部縣卒、徒隸、居

[第五行] 貲贖責（債）、司寇、隱官、踐更縣者簿，有可令傳甲兵，縣弗令傳之而興＝黔＝首＝，（興黔首）可省

[第六行] 少弗省少而多興者，輒劾移縣＝，（縣）亟以律令具論當坐者，言名決（決）秦守府。嘉、

[第七行] 穀、尉在所縣上書嘉、穀、尉。令人日夜端行，它如律令。

[16-6] 背

[第一行] 〔5〕三月庚戌（五日），遷陵守丞敦狐敢告尉：告鄉、司空、倉主，聽書從事。尉別書都

[第二行] 鄉、司＝空＝，（司空）傳倉；都鄉別啓陵、貳春，皆勿留脫。它如律令。／鈎手。〔6〕庚戌（三月五日）水下六

[第三行] 刻，走詔行尉。

⁴⁹ 舊釋文皆缺釋「巫」字，此釋最早由陳劍提出。參陳劍，〈讀秦漢簡札記三篇〉，頁 371 注 2。

⁵⁰ 這裏原壓有反印文「鄉」字（參圖一），此處按文意補上「伍」字。

[第四行] [11] 三月戊午（十三日），遷陵丞歐敢言之：寫上。敢言之。/
鉤手。[12] 己未（三月十四日）旦，令史犯行。
[留 空]
[第五行] [4] 【三】月戊申（三日）夕，士五（伍）巫下里聞令以來。/
慶半。 [1] 如手。

（一）視覺呈現——格式、標識符號和筆跡⁵¹

三件木牘上文字內容的分布似遵從同一個原則：凡是發文和收文機構的處理內容均由正面開始寫，位置不足便轉到背面的右側繼續，收文紀錄則從背面左側開始，若紀錄多於一個則往右移。兩種紀錄之間有留空，以起區隔作用。發文機構的經手紀錄均寫於背面左下方，收文機構的經手和行書紀錄則緊隨處理紀錄書寫。⁵²

比較[16-5]和[16-6]，兩牘正面不但內容相同，字跡、分行和標識符號的位置（包括分隔符號「┐」和「/」，以及重文符號「＝」）亦近乎一致。9-2283牘正面主體部分內容基本相同，只有正面第五行「可省少弗省而多興【者】」一句「弗省」之後抄漏了一個「少」字。該牘同樣分七行書寫，標識符號位置亦與另外兩牘吻合。因此，可以推斷三牘正面的主要內容是根據同一底本（或更準確地說，是源自同一祖本的底本）抄寫。然而，9-2283牘正面最後一行卻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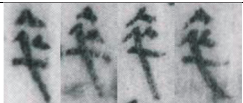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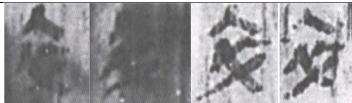
⁵¹ 李孟濤 (Matthias L. Richter) 早已指出，寫本 (manuscript) 中的文字 (writing) 是文本 (text) 的視覺呈現 (visual representation)，因此諸如寫法、標識符號、間距和格式等均屬於寫本的物質形態之範疇。參 Matthias L. Richter, "Textual Identity and the Role of Literacy in the Transmission of Early Chinese Literature," in *Writing and Literacy in Early China*, ed. Li Feng and David Prager Branner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1), p. 207。類似的觀點，又見富谷至提倡的「視覺木簡」之說，參氏著，《文書行政の漢帝国—木簡・竹簡の時代—》（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10）。

⁵² 胡平生曾提出「閱讀順序」的理論：「這類木牘文書讀完正面文字以後，轉到背面，要從最左側一行讀起，這是收到正面報告的記錄。」參胡平生，〈湘西里耶秦簡〉，頁 312。所謂的「閱讀順序」是就各項紀錄的日期先後而言，但對當時經手文書的刀筆吏來說，這些紀錄的書寫位置和分布的意義可能更大。日常的文書處理工作，不一定要求按時序完整地閱讀一份文書，刀筆吏（正如今天的秘書人員）很可能是根據需要，按木牘上的特定位置去尋閱相關內容。參黎明釗、馬增榮，〈試論里耶秦牘與秦代文書學的幾個問題〉，頁 56-65。後續的研究，參單育辰，〈里耶秦公文流轉研究〉，頁 199-209；張馳，〈《里耶秦簡（壹）》所見「往來書」的文書學考察〉，李學勤主編，《出土文獻》第 10 輯（上海：中西書局，2017），頁 164-179。

「洞庭守禮重曰」一段的內容，而且正面內容整體字體較小，容字亦較多。此外，9-2283 牘正面部分文字的筆跡似與其餘兩牘有別。

三牘正面互見重複的內容（即洞庭守禮最初下發的指示），多達二百一十三個文字或符號，在目前出土行政文書中甚為罕見，為筆跡對比研究提供絕佳的素材。我們把這些重複的內容逐字比對，三牘整體書寫風格上接近，尤其是 [16-5] 和 [16-6] 兩牘，部分文字的筆跡幾近一致（附表一）。⁵³ 這兩牘上的文字有一明顯特徵，就是部分文字的最後一筆常有稍微拉長的情況，但這項特點較少見於 9-2283 牘上。⁵⁴ 這可能由於 9-2283 正面字數較多，寫得較為擠迫所致，也可能由於它們的抄寫者不同。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三牘正面上多次出現的「卒」字，9-2283 牘的寫法明顯與另外兩牘不同。[16-5] 和 [16-6] 兩牘「卒」字中間的一橫，9-2283 牘「卒」字均作一撇。此字各牘上重複四次，絕不可能是偶然，可視為某書手的書寫習慣（表六）。此外，9-2283 牘背面左下方經手人署名「如手」的筆跡，也與其餘兩牘有別，但卻與其正面「洞庭守禮重曰」一段內容後所署的「如手」相當一致（表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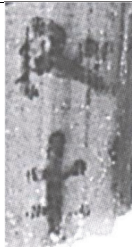
表六：9-2283、[16-5] 和 [16-6] 三牘正面上「卒」字筆跡比較

	[16-5] 正面	[16-6] 正面	9-2283 正面
卒			

⁵³ 如「當傳者多節（即）傳之，必先悉行乘城卒、隸臣妾」；「田時毆（也），不欲興黔首。嘉、穀、尉各謹案所部縣卒、徒隸、居貲贖責（債）、司寇、隱官、踐更縣者簿」；「嘉、穀、尉在所縣上書嘉、穀、尉。令人日夜端行」等多處筆跡幾近一致。參附表一。

⁵⁴ 如 [16-5] 和 [16-6] 兩牘上的「卒」、「史」、「嘉」、「穀」、「及」、「巴」、「郡」、「先」、「傳」、「時」和「人」等字。參附表一。

表七：9-2283、[16-5] 和 [16-6] 三牘上「如手」字筆跡比較

	[16-5] 背面 左下方	[16-6] 背面 左下方	9-2283 背面 左下方	9-2283 正面
如手				

這些筆跡上的些微差異能否說明 9-2283 牘與 [16-5] 和 [16-6] 兩牘正面的抄寫者有別？首先，目前的研究已經指出，如果文書的性質為抄本的話，「某手」的紀錄很可能不是由「某」親書。⁵⁵ 因此，即使三牘正面內容同署「如手」，文

⁵⁵ 關於「某手」，主流的看法是等同書寫者。書寫當然是經手一份文書的主要工作，不過目前的研究已經指出，即使注明「某手」的紀錄，如果該文書是抄本而不是原件的話，可以不是由「某」所寫，而這個負責抄寫的人不需署上自己的名字，為抄寫的內容負責（如單育辰，〈里耶秦公文流轉研究〉，頁 199）。筆者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反證去說明「某手」應該具有抄寫以外的責任。如果「某手」僅為紀錄抄寫者的責任，轉抄者理應也要寫上他的名字以示負責。此外，處理帶有刻齒的券書時，「某手」中的「某」（一般為史或佐）不獨要負責書寫券書上的文字內容，還要製作對應文字內容中所載數字的刻齒，這應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書寫」可以概括的責任。參 Tsang Wing Ma, "Scribes, Assistants, and the Materiality of Administrative Documents in Qin-Early Han China: Excavated Evidence from Liye, Shuihudi, and Zhangjiashan," *T'oung Pao* 103.4/5 (2017): 322-332。關於這些刻齒的製作，還有一點可以補充。張春龍、初山明和大川俊隆合著的〈里耶秦簡刻齒簡研究——兼論嶽麓秦簡《數》中的未解讀簡〉（《文物》2015.3：54），僅稱它們是用「刻刀」製作。筆者曾就此種「刻刀」去信請教張春龍先生。張先生於二〇一七年九月五日的回覆說：「刻齒時所用刀具肯定是『削』……就考古發現而言，與簡牘同出土的必有『削』。」削或書刀是秦代刀筆吏工作時必須攜帶的工具，經手券書的史或佐應該就是主要負責製作這些刻齒的人。最近，吳方基也提出，里耶出土券書上的「某手」應理解成券書的製作者。見吳方基，〈里耶秦簡「付受」與地方國有財物流轉運營〉，《中華文化論壇》2018.4：62 注 2。拙見以為，把「某手」解釋為涵義較廣的經手，仍是較為恰當而且安全的做法，尤其是當我們處於新資料不斷湧現的時代；而這一方法並不排除「書寫」是「經手」一份文書的主要責任。

書也不一定是由「如」所抄寫。其次，即使是由同一人所書，筆跡也不一定完全相同。這可能受抄寫者的心情、環境、書寫工具等因素所影響，⁵⁶ 也可能由於抄寫者的職業訓練所致。正如李孟濤所言「職業抄寫者通常有可能掌握多種類型與風格的文字書寫技能」，「一般來說，我們寧可假設這些書寫者是受過專門訓練的技工，他們必須遵守特定的並非其自身選擇的書寫慣例」。⁵⁷ 又如富谷至和邢義田所論，展現個人風格的書法藝術應是漢魏以後的發展。⁵⁸ 本文就此僅補充一點，如果抄手所據的底本來源相同，即使不同的抄手，它們的筆跡也可能因此變得接近。這可能出於刻意模仿，但也可能只是不自覺下出現的行為。特別在抄寫重要文書時（如郡守的命令），抄寫者可能會因此格外小心，遵照底本的文字來抄，不自覺地模仿底本的筆跡。⁵⁹ 這或許能夠解釋為何 9-2283 牘正面主要内容在整體風格上與 [16-5] 和 [16-6] 兩牘正面大致趨同，但個別文字的筆跡有異。配合下文的分析，[16-6]、[16-5] 兩牘與 9-2283 牘正面或有可能分別由鄰縣

⁵⁶ 參邢義田，〈漢代簡牘公文書的正本、副本、草稿和簽署問題〉，氏著，《今塵集：秦漢時代的簡牘、畫像與文化流播》（上海：中西書局，2019），頁 204。

⁵⁷ 李孟濤，〈試談郭店楚簡中不同手蹟的辨別〉，卜憲群、楊振紅主編，《簡帛研究二〇〇六》（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頁 12, 14。原文參見 Matthias Richter, "Tentative Criteria for Discerning Individual Hands in the Guodian Manuscripts," in *Rethinking Confucianism: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xcavated Chinese Manuscripts, Mount Holyoke College, April 2004*, ed. Xing Wen (San Antonio: Trinity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132-147, 引文據中譯本。

⁵⁸ 富谷至，《文書行政の漢帝国》，頁 141-171；邢義田，〈漢晉公文書上的「君教『諾』」、署名和畫諾——讀《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選釋》札記〉，氏著，《今塵集》，頁 315。關於書法藝術，還需要留意初入門者必須從臨摹開始，個人藝術風格之展現應只適用於進階者。

⁵⁹ 雖然 9-2283 牘上同一段內容抄漏了「少」一字（正面第五行），但所有符號的位置皆與另外兩牘完全一致，顯然是抄寫者小心翼翼按底本抄寫的結果。由此可見，文本的權威（或所代表的權威）起著規範抄本的內容和形式的作用。關於古代中國文本的權威性，參 Mark Edward Lewis, *Writing and Authority in Early China*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9)。關於古代中國文本的「流動性」和「固定性」，參來國龍，〈論戰國秦漢寫本文化中文本的流動與固定〉，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主編，《簡帛》第 2 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頁 515-528。誠如該文所指出，出土行政文書和古書典籍在這方面實有不少可比之處。具體的成果，可參 Matthias L. Richter, "Faithful Transmission or Creative Change: Tracing Modes of Manuscript Production from the Material Evidence," *Asiatische Studien/Études Asiatiques* 63 (2009.4): 889-908。

的兩位刀筆吏根據同一份文書底本抄寫，再先後傳遞至遷陵縣。⁶⁰ 與此相對，9-2283、[16-5]和[16-6]三牘背面遷陵縣的處理紀錄都是由「釗」經手，雖然字的結構大致相同，但書寫風格差異甚大，有正有歪，有大有小。這當然可能因為它們是由不同抄手所寫，但亦有可能由於這部分內容的性質僅為存檔所用，並非送出的正式版本，⁶¹ 抄手是否用統一風格書寫，不會有大太差別。

（二）文書結構

上節討論文字的呈現方式時已稍微提及三件木牘的文書結構，本節將集中討論此一問題。以下先按日期梳理三牘上的各項紀錄，作為討論的基礎（表八）：

表八：9-2283、[16-5]和[16-6]三牘上的各項紀錄整理表

1	廿七年二月庚寅（十五日）	洞庭守禮調縣嗇夫、卒史嘉、段（假）卒史穀、屬尉：……令人日夜端行，它如律令。……如手。	9-2283 正、背 [16-5] 正、背 [16-6] 正、背
2	廿七年二月壬辰（十七日）	洞庭守禮重曰：……新武陵言書到。 / 如手。	9-2283 正、背
3	廿七年二月癸卯（廿八日） 水十一刻 = （刻）下九	求盜簪襄陽成辰以來。 / 弱半。	[16-5] 背
4	廿七年三月戊申（三日） 夕	士五（伍）巫下里聞令以來。 / 慶半。	[16-6] 背

⁶⁰ 若根據李孟濤的簡帛筆跡分析，我們可以從大至小，分為「文字類型」、「文字風格」和「手蹟（跡）」三個層次去理解一份文本上的筆跡。文字類型包括結字和字型等形態學上的方面。文字風格則「隨著文字的字體結構或單個筆畫統一性和精確性不同程度的變化而變化。這種變化也有可能隨著書寫速度、間隙疏密、文字傾斜度及其它諸因素的變化而變化」。這些因素固然可用作判斷不同手跡的準則，但不同手跡也可以同時寫出風格一致的文字。套用這三層次的分析，也可幫助我們理解，9-2283 牘與[16-5]、[16-6]兩牘正面部分書寫風格趨同，但分屬兩種手跡的現象。參李孟濤，〈試談郭店楚簡中不同手蹟的辨別〉，頁 12-13。

⁶¹ 目前的研究指出，這類文書抵達遷陵縣後，性質上發生轉變。原文書雖會抄寫遷陵縣的處理紀錄，但僅留作存檔用，遷陵縣會另外抄寫一份送出，作為正式的版本。參張馳，〈《里耶秦簡（壹）》所見「往來書」的文書學考察〉，頁 172-175，當中綜合了多位學者在此一問題上的成果。

5	廿七年三月庚戌（五日）	遷陵守丞敦狐敢告尉：告鄉、司空、倉主，聽書從事……它如律令。	[16-6] 背
6	廿七年三月庚戌（五日） 水下六刻	走招行尉。	[16-6] 背
7	廿七年三月癸丑（八日） 水下盡	巫陽陵士【伍】句以來。 / 邪半。	[16-5] 背
8	廿七年三月丙辰（十一日）	遷陵丞歐敢告尉：告鄉、司空、倉主，前書已下，重聽書從事……它如律令。	[16-5] 背
9	廿七年三月丙辰（十一日） 水下四刻	隸臣尚行。	[16-5] 背
10	廿七年三月丁巳（十二日） 水下七刻	隸臣移以來。 / 爽半。	9-2283 背
11	廿七年三月戊午（十三日）	遷陵丞歐敢言之：寫上。	[16-6] 背
12	廿七年三月己未（十四日） 旦	令史犯行。	[16-6] 背
13	廿七年三月辛酉（十六日）	遷陵丞歐敢告尉：告鄉、司空、倉主，聽書從事……它如律令。即報西陽書到。	9-2283 背
14	廿七年三月壬戌（十七日）	隸臣尚行尉及旁。	9-2283 背

我們可以按三牘上各項紀錄的日期和時間，分成十四項內容，當中不少在性質上有所重複。值得留意，如果按時序排列，這些紀錄交錯地分布在三件木牘上，顯示這批文書的收發和處理，是在同一段時間內（三十三日）交錯地發生。下表整理這十四項紀錄在三件木牘上的分布（表九）：

表九：9-2283、[16-5] 和 [16-6] 三牘上的各項紀錄分布表

	2/15	2/17	2/28	3/3	3/5	3/5	3/8	3/11	3/11	3/12	3/13	3/14	3/16	3/17
9-2283	1	2								10			13	14
[16-5]	1		3				7	8	9					
[16-6]	1			4	5	6					11	12		

以下先嘗試按表八及九各項紀錄的序號綜合整理這些紀錄：

1. 三件木牘均記載由洞庭守禮於廿七年二月庚寅日（十五日），發給轄下屬縣以及其屬吏卒史嘉、假卒史穀和屬尉三人，關於徵發勞動力運送甲兵的指示。然而，三牘均沒有紀錄這份指示，實際從洞庭郡傳遞出去的日期和時間。⁶² 這份文書由名叫「如」的人經手。
2. 僅在兩天之後，二月壬辰日（十七日），洞庭守禮「重曰」文書的傳送路線和方法，規定由新武陵分四道送出，「以道次傳別書」，書到各縣必須相報。凡不報者，追之。文書皆以「郵、門亭行」。這段以「重曰」起首的內容，僅載於 9-2283 牘上，同樣由「如」經手。
3. 洞庭守禮初次下達指示十三日後，即二月癸卯（廿八日），[16-5] 牘記載了當天——亦即三牘中首個——收文紀錄。紀錄顯示該文書是由任職求盜，原籍陽成里，擁有第三級爵位（簪裹）的辰於當天「水十一刻，刻下九」送來，並由名為「弱」的人打開該文書。
4. 三牘中第二個收文紀錄出現在 [16-6] 牘上。[16-6] 牘記載同年三月戊申日（三日）夕，⁶³ 洞庭郡初次發出文書十八日後，原籍巫縣下里的士伍聞令送來文書，並由「慶」打開。
5. [16-6] 牘記載了兩日之後，即庚戌日（三月五日），遷陵守丞敦狐的處理。敦狐要求遷陵尉轉告各鄉、司空和倉的主事者洞庭郡的指示，並讓他把文書分兩路轉發，一路由司空傳倉，一路由都鄉別書啓陵、貳春二鄉。
6. 同日（三月五日）水下六刻，由走詔送到遷陵尉處。
7. 三月癸丑日（八日），自洞庭郡初次發出文書二十三日後，[16-5] 牘記載了巫縣陽陵里士伍句於當天水下盡時，把文書從某處送來，且由「邪」啓封。這是三牘中的第三個收文紀錄，亦是 [16-5] 牘上第二個收文紀錄。
8. [16-5] 牘同時記載了三日之後的丙辰日（十一日），遷陵縣的處理和發出紀錄。遷陵縣的負責人換成遷陵丞歐，他特別強調「前書已下，重聽書從事」。

⁶² 目前公布的里耶秦簡顯示，某一機構處理文書的日期和該文書實際送出的日期常有間距。以這三件木牘為例，遷陵縣於廿七年三月戊午（十三日）和辛酉（十六日）兩日處理的文書，均要待至翌日（十四和十七日）才送出。洞庭守禮最初的指示實際於何時離開洞庭郡？以目前的資料而言，並不可知。

⁶³ 三件木牘同時用上了時稱和漏刻兩種記時法。據陳侃理最新的研究，這種交替地用不同記時法的情況在里耶秦簡中並不罕見。參陳侃理，〈里耶秦簡牘所見的時刻記錄與記時法〉，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簡帛》第 16 輯，頁 179-190。

9. 同日（三月十一日）水下四刻，隸臣尚把文書按同樣的傳遞方向送出。
10. 經歷了二十五日，洞庭守禮的「重曰」文書於三月丁巳（十二日）水下七刻，由隸臣移送來，並由「爽」打開文書。此為三牘中時間最晚的一個收文紀錄，並載於 9-2283 牘上。
11. 遷陵丞歐並沒有立刻處理該「重曰」文書，反而於翌日（十三日）把八日之前，載於 [16-6] 牘上，遷陵守丞敦狐的處理紀錄抄寫上報洞庭郡。
12. 翌日己未（三月十四日）旦，由令史犯送出。
13. 待至三月辛酉（十六日），遷陵丞歐回頭處理載於 9-2283 牘上的「重曰」文書，處理方法與庚戌（五日）和丙辰（十一日）兩日的做法大體相同，僅加上「即報西陽書到」一句。從三月庚戌（五日）到辛酉（十六日），遷陵縣處理的文書均由「釗」經手。
14. 翌日（三月十七日），隸臣尚把文書送到遷陵尉以及旁縣西陽。⁶⁴ 這是隸臣尚自丙辰日（三月十一日）以來，第二次為遷陵縣送出相關文書。

參閱以上的綜合整理，有數個問題尚待澄清：第一，洞庭守禮的指示為何在短時間內多次傳遞至遷陵縣？洞庭守禮於二月壬辰日（十七日）下令發出的「重曰」文書，距最初發出的指示（二月十五日）僅兩天，為何這麼迫切？第二，三牘上共有四個收文紀錄，唯獨 [16-5] 牘上有兩個，這是否代表 [16-5] 上所載文書曾兩次送抵遷陵縣，還是第二個收文紀錄顯示文書曾經他處傳到遷陵縣？這些文書是以何種方式傳遞？第三，為何遷陵丞歐在三月丁巳日（十二日）收到「重曰」文書後，沒有即時處理，反而於翌日（三月十三日）「寫上」稍早前由守丞敦狐的處理紀錄？第四，既然這三件木牘從其出土形態和文字內容可確定它們是作存檔用的，它們如何能反映當時的文書處理和存檔習慣？這些問題將於以下兩節分別解答。

⁶⁴ 9-2283 牘所指的「旁」是遷陵丞歐下令「報書」的旁縣西陽。可直接比較的例子是 8-158。該牘是遷陵守丞色報書西陽丞主，回覆已收到該縣轉來的「絡帛直書」，其行書紀錄記載「守府快行旁」。當中的「旁」字也是指旁縣西陽。其他可比較的例子還有 9-2287，當中把向西陽縣移送文書一事，稱為「移旁」。遷陵和西陽兩縣之間的文書傳遞，參藤田勝久，〈里耶秦簡所見秦代郡縣的文書傳遞〉，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簡帛》第 8 輯，頁 188-189。儘管洞庭郡內的傳遞路線曾經改變，西陽處於遷陵前一站的情況似乎一直固定未變，詳下文。

（三）文書處理中的「重」和「追」

我們先解決第一個問題。9-2283 牘正面比 [16-5] 和 [16-6] 兩牘正面多了「洞庭守禮重曰」一段的內容。「重」，字面上可解作「重複」、「重新」和「再次」等的意思，⁶⁵ 但作為一行政文書上使用的程序用語，它究竟在什麼情境下使用？代表（或暗示）何種程序？以下先看另一組文書。

9-48 正

[第一行] [1] 卅一年後九月庚辰朔乙巳（廿六日），啓陵鄉守敢言之：

[第二行] 佐敢為段（假）令史，以乙巳視事，謁令官假

[第三行] 【養、走】。敢言之。

9-48 背

[第一行] [4] 卅二年十月己酉朔壬子（四日），遷陵丞昌下倉：以律令從事。 / 囹手。 / [5] 守

[第二行] 府□下倉，隸臣□行。

[第三行] [2] 十月庚戌（二日）十一刻＝（刻）下九，隸妾□以來。 / □半。 [1] 敢手。

9-30 正

[第一行] [1] 卅一年後九月庚辰【朔乙巳（廿六日），啓陵】鄉守敢言之：佐敢為段（假）令史，以乙巳視事，

[第二行] 謁令官假養、走。敢言之。 / [3] 卅二年十月己酉朔辛亥（三日），啓陵鄉守

[第三行] 敢言之：重謁令官問敢當得養、走不當＝？（當），何令史與

[第四行] 共？不當，問不當狀。皆具為報，署主戶發。 / 敢手。

9-30 背

[第一行] [7] 十月甲寅（六日），遷陵丞昌謂倉嗇夫：以律從事，報之。 / 囹

[第二行] 手 / [8] □水下盡，隸臣□行。

⁶⁵ 「重」在特定情境下也可理解為「重大」、「嚴重」等意思，但似乎不適合本文所論的例子。關於「重」，參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簡牘研究班編，《漢簡語彙—中国古代木簡辭典—》（東京：岩波書店，2015），頁 246-247；鷹取祐司，《秦漢官文書の基礎的研究》，頁 250。

[留 空]

[第三行] [6] 十月甲寅（六日）日入，□□人以來。 / 園發。 [1] 取手。
雖然 9-48 和 9-30 兩牘的主體為啓陵鄉的上呈文書，與 9-2283、[16-5]和[16-6]為洞庭郡的下發文書不同，但是兩者在結構上卻有可比之處。⁶⁶ 分析這組文書的結構，或有助我們回答上節提出的疑問。⁶⁷ 以下按上文分析 9-2283、[16-5]和[16-6]一組文書結構的做法，把 9-48 和 9-30 兩牘上的紀錄按日期先後列出，再顯示這些紀錄在兩牘上的分布（表一〇和一一）。

表一〇：9-48 和 9-30 兩牘上的各項紀錄整理表

1	卅一年後九月乙巳（廿六日）	啓陵鄉守取敢言之：佐取為段（假）令史，以乙巳視事，謁令官假養、走。敢言之。……取手。	9-48 正、背 9-30 正、背
2	卅二年十月庚戌（二日）十一刻 = （刻）下九	隸妾□以來。 / □半。	9-48 背
3	卅二年十月辛亥（三日）	啓陵鄉守取敢言之：重謁令官問取當得養、走不當…… / 取手。	9-30 正

⁶⁶ 參看圖版，9-48 牘正背面似皆殘留兩道編繩痕跡，未知是否曾與 9-30 編在一起。如是，則可為當時的存檔習慣另添一例證。

⁶⁷ 關於這兩件木牘，還有一有趣的發現。兩牘上分別出現了「某發」和「某半」的紀錄。邢義田曾指出，「某半」集中在始皇廿六至卅一年的簡牘，「某發」全屬卅一年或以後，並推測在卅一年左右某些文書用語曾出現改變。陳偉後又補充道，「某半」最遲的例子應在卅年六月(8-1566)，「某發」最早則出現於卅年九月（9-982[9-981]，陳偉所引為出土號）。然而，參看 9-48 和 9-30 兩牘，「某半」出現於卅二年十月庚戌（二日），「某發」出現於同年十月甲寅（六日）。如果邢義田和陳偉的推測正確，當時真的曾發生文書用語的改革，這個改革的執行看似並不嚴格，或部分刀筆吏尚未適應這一文書用語的改革。參邢義田，〈「手、半」、「日玚日荊」與「遷陵公」——里耶秦簡初讀之一〉，氏著，《今塵集》，頁 369；陳偉等，《秦簡牘整理與研究》（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17），頁 11；並參 Staack, “Single- and Multi-Piece Manuscripts in Early Imperial China,” pp. 36-37。

4	卅二年十月壬子（四日）	遷陵丞昌下倉：以律令從事。 / 囹手。	9-48 背
5	卅二年十月壬子（四日）	守府□下倉，隸臣□行。	9-48 背
6	卅二年十月甲寅（六日）日入	□□人以來。/ 囹發。	9-30 背
7	卅二年十月甲寅（六日）	遷陵丞昌調倉嗇夫：以律從事，報之。/ 囹手。	9-30 背
8	卅二年十月甲寅（六日）□水下盡	隸臣造行。	9-30 背

表一：9-48 和 9-30 兩牘上的各項紀錄分布表

	9/26	10/2	10/3	10/4	10/4	10/6	10/6	10/6
9-48	1	2		4	5			
9-30	1		3			6	7	8

事緣啓陵鄉佐取遷任為假令史，⁶⁸ 卅一年後九月庚辰朔乙巳（廿六日）開始視事，需要配置養、走，啓陵鄉守取就此事向遷陵縣於同一日提出請求。⁶⁹ 文書於六日後，即十月庚戌（二日）到達遷陵縣。然而，遷陵縣尚未回覆之際，啓陵鄉守取於十月辛亥日（三日）又寄來一文書，重複抄寫乙巳日的文書後，「重謁令官問取當得養、走不當」。啓陵鄉守取進一步詢問若假令史取符合資格獲分配養

⁶⁸ 史和佐的關係，參 Ma, “Scribes, Assistants, and the Materiality of Administrative Documents in Qin-Early Han China,” pp. 298-322；馬增榮，〈漢代地方行政中的直符制度〉，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簡帛》第 16 輯，頁 262, 264-265。近日公布的睡虎地 77 號墓出土簡牘顯示，墓主越人曾於漢文帝前元十年（前 170）至後元七年（前 157）之間，在安陸縣長期擔任鄉佐一職，期間曾一度出任為守令史。取和越人的職業生涯或可比較。參熊北生、陳偉、蔡丹，〈湖北雲夢睡虎地 77 號墓出土簡牘概述〉，《文物》2018.3：43-53；Chen Wei and Cai Dan, “Yue Ren, Luli, and Anlu: the Tomb Occupant of Yunmeng Shuihudi Han Tomb No. 77 and the Village Where He Resided,” *Bamboo and Silk* 3.2 (2020): 232-274. 關於「守」和「假」，高震寰認為，「『守』指有本職，而臨時代理某官。『假』指在有任務需求，但現有制度無法處理的情況下權宜假號。」暫備一說。參高震寰，〈試論秦漢簡牘中的「守」，「假」，「行」〉，王沛主編，《出土文獻與法律史研究》第 4 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頁 58-59。

⁶⁹ 此處啓陵鄉守和鄉佐均名「取」。守嗇夫和佐同名的現象又見於 9-2314。該牘記載司空守和經手文書的佐均名「沈」。估計里耶秦簡中的同名現象應該不少。學者僅憑某位官吏的名字（多是「某手」的紀錄）去復原其遷轉路徑的做法，或需斟酌。

和走，他應與哪一位令史共用養和走；若果假令史取不符合資格，請解釋原因，報書中注明由主戶打開。翌日，遷陵丞昌把乙巳日的文書下傳至倉，指示其按律令處理，但沒有下令報書回覆。兩日後，辛亥日的「重謁」文書到達，遷陵丞昌把文書下發倉嗇夫，並按啓陵鄉的請求，提醒他要「以律令從事，報之」。

與 9-2283、[16-5] 和 [16-6] 一組文書比較，9-48 和 9-30 一組文書同樣在短時間內重複了最初發出文書的內容。9-30 牘上先紀錄了啓陵鄉原來上呈遷陵的文書，然後才是「重謁」的內容。其次，啓陵鄉取發出文書七日後，未待遷陵縣回覆，便「重謁令官問取當得養、走不當」，並進一步詢問走、養的分配情況，要求報書答覆。這與洞庭守禮發出指示兩日後，「重曰」文書的傳遞路徑，要求文書所經之縣相報書類似。在這兩個例子中，「重」這一程序用語，不單含有「再次」之義，而且均起著補充訊息和催促回覆的作用。關於「重」，里耶秦簡中還以下的用例，參見例一至三：

例一：「重」

9-21 正

[第一行] □□□【錢校券一，告臨漢受責計，為報。有追】曰：已出計
[第二行] 卅一年。今問：前書、券不到，追書卅二年三月戊子（十二日）
到，後
[第三行] 計。今臨漢計卅二年，謁告遷陵以從事，而自辟留、
[第四行] 亡書者，當論。敢言之。／七月乙未（廿一日），⁷⁰ 臨漢守丞都移

9-21 背

[第一行] 遷【陵】。／臞手。
[第二行] 八月乙巳（朔日），⁷¹ 臨漢丞禮敢告遷陵丞主：重。敢告
[第三行] 主。／差手。／卅三年十月甲辰朔癸亥（廿日），遷陵守丞敢告
[第四行] ……

例二：「寫重」⁷²

8-653 正+9-1370 正

[第一行] 元年八月庚午朔朔日，遷陵守丞固敢言
[第二行] 之：守府書曰：上真見兵，會九月朔日守府。・今上應（應）

⁷⁰ 卅二年七月朔日為乙亥，見 9-507。

⁷¹ 卅二年八月朔日為乙巳，見 8-2247。

⁷² 「寫重」又見 9-705+9-1111+9-1426。

[第三行] 書者一牒。敢言之。 / 九月己亥朔己酉（十一日），遷陵【守】

丞固

8-653 正+9-1370 背

[第一行] 敢言之：寫重。敢言之。 / 贛手。□

[第二行] 贛□

例三：「謁重」

9-1871+9-1883+9-1893+9-2469+9-2471 正

[第一行] 卅三年三月辛未朔癸未（十三日），庫守□敢言之：守府書曰：

義陵□□□用度□五件，其

[第二行] 取二件。遷陵今寫守□□為信符一封元□謁告遷陵。符到，謁報，報署

[第三行] 工用發。□。敢言之。

[第四行] 三月辛未朔□□，□□敢言之：謁重。敢言之。 / 鄭手。

[第五行] 三月辛□朔□□，庫□敢言之：謁重。敢言之。 / 鄭手。

[第六行] 四月辛丑朔壬【寅】（二日），⁷³ 庫守□言之：書與已三追，謁重。敢言之。 / 鄭手。

9-1871+9-1883+9-1893+9-2469+9-2471 背

[第一行] 四月辛丑朔【己】酉（九日），⁷⁴ 庫□□敢言之：書與已四追，至今未報。謁重。敢言

[第二行] 之。 / 鄭□

[第三行] 四月辛丑朔庚戌（十日），貳……【丞】歐敢告遷陵丞主：移，敢告主。 / □

[第四行] 手 / 五月庚午朔辛卯（廿二日），遷陵守丞殷告庫主：書皆已下，聽書，以律令

[第五行] 從事。 / 囹手。 / 五月辛卯（廿二日）旦，隸妾□行。

[第六行] 五月己丑（廿日）日中，酉陽隸妾亭以來。 / 橫發。 鄭手。

例一至三中的「重」均有催促回覆之意。例一，臨漢守丞於卅二年七月乙未（廿一日）移書遷陵，八月乙巳（朔日）「重」複同樣內容，傳至遷陵縣。兩份文書

⁷³ 「寅」字原缺釋。從四月朔日至庚戌日，僅壬寅一日含「壬」字，據此補上「寅」。

⁷⁴ 「己」字原缺釋。從四月朔日至庚戌日，僅己酉一日含「酉」字，據此補上「己」。

相隔僅十日。例二，遷陵守丞於元年八月庚午朔朔日上應書洞庭守府，九月己亥朔己酉（十一日）又再「寫重」呈上。兩份文書相距一個月零十日。兩例或許是由於對方未有回覆，因而重複抄寫同樣內容的文書，以催促對方報書。但例一的臨漢屬他縣，十日內就重複移書催促，是否過急呢？⁷⁵ 例三的「謁重」與 9-48 和 9-30 一組文書的「重謁」相類。此例特別提到「追」。從卅三年三月癸未（十三日）至四月己酉（九日），不足一個月之內，某縣的庫守竟謁重「四追」。⁷⁶ 有關「追」這一程序，秦律中有明確的規定：

行傳書、受書，必書其起及到日月夙莫（暮），以輒相報毆（也）。書有亡者，亟告官。隸臣妾老弱及不可誠仁者勿令。書廷辟有日報，宜到不來者，追之。 行書⁷⁷

〈□律〉曰：傳書受及行之，必書其起及到日月夙莫（暮），以相報，報宜到不來者，追之。 書有亡者，亟告其縣官。不從令者，丞、令、令史主者貲各一甲。⁷⁸

鷹取祐司認為「追」可理解為「催促」、「督促」之意。⁷⁹ 上引律文所見，若文書得不到預期的回覆（「宜到不來者」），便需啟動「追」這一程序。然而，沈剛留意到，里耶秦簡中有部分文書在短時間內，未等待回覆就立刻發出催辦文書，推測這可能是由於對收文機構能否及時回覆沒有把握所致。⁸⁰ 劉自穩更指出，部分的「追」還起著補充訊息的作用。⁸¹ 此外，劉自穩的研究還可補充沈剛的觀察，他指出：「發送原文書到追書的時間間隔往往短於收發文機構間的一般往返行書時間，意即在一般情況下的行書時間內，第一份文書的回覆還未到即發送了追書，似乎說明發文機構發送追書並未考慮兩地之間的行書時間抑或對行書

⁷⁵ 臨漢所在何地，以目前資料而言，並未可知。從地名推測，或在漢水附近。

⁷⁶ 短時間內多次發「追書」的例子，又見於 8-704+8-706 牘，以及 8-755 至 8-759 和 8-1523 一組文書。

⁷⁷ 陳偉，《秦簡牘合集·壹》，頁 144。

⁷⁸ 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肆）》（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5），頁 142。

⁷⁹ 鷹取祐司，《秦漢官文書の基礎的研究》，頁 250。

⁸⁰ 沈剛，〈秦代縣級檔案文書的處理周期——以遷陵縣為中心〉，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編，《出土文獻研究》第 15 輯（上海：中西書局，2016），頁 140。

⁸¹ 前引例一引述的「追」亦具同樣功能，似乎用「追」來補充訊息並非特殊之例。

時間沒有較為明確的把握，那麼追書行為可能存在較大的隨意性。」⁸² 對於這種「追書行為」，楊先雲認為可能源自掉失文書的焦慮。確實，里耶秦簡中有「恐前書不到」(8-1562)、「前書、券不到」(9-21)、「前書畏其不」(8-1459+8-1293+8-1466)等記載。她指出，多次催促回覆就是為了避免掉失文書，目的在「提高文書處理的效率」。⁸³

姑勿論是否同意以上諸位的解釋，在里耶秦簡中，原文書發出後，短時間內不等待對方回覆，就發書催促或追加補充訊息的情況相當常見。從這個認識基礎上重看 9-2283、[16-5]、[16-6]與 9-48、9-30 這兩組文書就不會感到奇怪。兩組文書雖然未言「追」，但「重」和「追」是行政文書中經常同時出現的程序術語，在西北漢簡中「重追」更是一個常見的複合詞。⁸⁴ 值得注意，上引例三最初兩次「謁重」時並未言及「追」，但到第三次「謁重」時，提到「三追」。可見「重」也有（或暗示）「追」的意思，只是未必會明言。9-2283 牘上「重曰」和 9-30 牘上「重謁」的內容，與里耶秦簡所見到的「追」一樣，均有補充訊息或催促回覆的作用。⁸⁵ 配合下節關於三件木牘傳遞方式的分析，我們可更清楚了解洞庭守禮在短時間內重發文書，追加補充內容的原因。

（四）文書傳遞

關於三件木牘的傳遞方式，下文先按三牘上四個收文紀錄，計算文書傳遞的日數。必須再次言明，我們目前只掌握洞庭守禮下令發出文書的日期，但並不清

⁸² 劉自穩，〈里耶秦簡中的追書現象——從睡虎地秦簡一則行書律說起〉，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編，《出土文獻研究》第16輯（上海：中西書局，2017），頁159。一個劉自穩未及引用的佳例是 9-2287。該牘顯示遷陵縣向西陽縣發報書前四日，西陽縣已發追書催報。當收到追書後，遷陵縣只好再報一次。

⁸³ 楊先雲，〈秦代行政文書制度管窺——讀里耶秦簡札記〉，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中國人民大學分中心編，《出土文獻的世界——第六屆出土文獻青年學者論壇論文集》（上海：中西書局，2018），頁103-104。

⁸⁴ 如居延新簡 E.P.T50:48：「七月癸亥，宗正丹、郡司空、大司農，承書從事，下當用者，以道次傳別書，相報。不報者，重追之。書到言。」見張德芳主編，《居延新簡集釋》（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2016），頁496。鷹取祐司《秦漢官文書の基礎的研究》（頁266注20）認為「重追」，應理解為「再度督促」的意思。甚是。

⁸⁵ 補充訊息和催促回覆有時實難以區分。例如現代人的電子通訊中，如不欲直接追問回覆，則通過補充資料來間接達到同一目的。

楚文書實際從洞庭郡離開的日期和時間。下表估計的數字，只是傳遞日數的最大可能值（表一二）：⁸⁶

表一二：9-2283、[16-5]和[16-6]三牘上的收文紀錄

	洞庭守禮發書日期	收文紀錄	傳遞日數
[16-5]	廿七年二月庚寅 （十五日）	（廿七年）二月癸卯（廿八日）水 十一刻＝（刻）下九，求盜簪裏陽 成辰以來。／弱半。	十三日
[16-6]	廿七年二月庚寅 （十五日）	（廿七年）三月戊申（三日）夕， 士五（伍）巫下里聞令以來。／慶 半。	十八日
[16-5]	廿七年二月庚寅 （十五日）	（廿七年）三月癸丑（八日）水下 盡，巫陽陵士【伍】句以來。／邪 半。	二十三日
9-2283	廿七年二月壬辰 （十七日）	（廿七年）三月丁巳（十二日）水 下七刻，隸臣移以來。／爽半。	二十五日

據目前公布的里耶秦簡，文書從洞庭郡送到遷陵縣，無論是以何種方式，都不可能在十三日之內傳達。⁸⁷ 因此，我們可以首先排除[16-5]牘上兩個收文日期，反映該牘所載的文書曾兩度抵達遷陵縣的說法。其次，[16-5]牘上第二個收文紀錄能否透露文書的送出地呢？根據上引釋文，士伍句原籍巫縣陽陵里。巫縣所在何地？《漢書·地理志》記載該縣隸屬南郡。⁸⁸ 后曉榮據相家巷出土秦封泥，指出秦併楚後曾設巫黔郡，巫縣當隸屬此郡。⁸⁹ 無論巫縣隸屬何郡，均在洞庭郡範圍以外，洞庭郡發給屬縣的文書不可能遠經他郡傳送。此外，洞庭郡的外郡人口眾多，⁹⁰ 文書傳遞者的籍貫與文書的送出地似乎沒有必然的聯繫。

⁸⁶ 類似的計算方式，又參唐俊峰，〈秦代遷陵縣行政信息傳遞效率初探〉，頁206-207。

⁸⁷ 參劉自穩，〈里耶秦簡中的追書現象〉，頁158-159；唐俊峰，〈秦代遷陵縣行政信息傳遞效率初探〉，頁206-207。

⁸⁸ 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卷二八上，〈地理志上〉，頁1566。

⁸⁹ 后曉榮，《秦代政區地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頁73-74。

⁹⁰ 參游逸飛，〈里耶秦簡所見的洞庭郡——戰國秦漢郡縣制個案研究之一〉，《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61（2015）：49-66；魯家亮，〈里耶秦簡所見秦遷陵縣吏員的構成與來源〉，李學勤主編，《出土文獻》第13輯（上海：中西書局，2018），頁202-210。

那麼，[16-5] 牘會否經由卒史嘉、假卒史穀和屬尉的治所轉發到遷陵縣？關於卒史，初山明有相當好的研究。他指出，卒史是郡屬下的「移動」官吏，主要承擔屬縣的監察和覆獄工作。他們「治」無定處，且會隨其監察工作而轉移。⁹¹ 9-2283、[16-5]、[16-6] 三牘記載洞庭守禮指示嘉、穀和尉三人，在他們各自負責的屬縣內（見「各謹案所部」一句），若發現有違反其教令者，「輒劾移縣，縣亟以律令具論當坐者」，正體現了三人的監察職責；並且可知他們應是分處三地，而非有同一治所。此外，初山明又注意到「嘉、穀、尉在所縣」一句，由此可見三人並非固定處於一縣，而是隨職務需要而移動。⁹² 初山明的分析相當具說服力，[16-5] 牘當不可能經卒史嘉、假卒史穀和屬尉三人的共同治所轉發到遷陵縣。考慮文書開首「洞庭守禮調縣嗇夫、卒史嘉、段（假）卒史穀、屬尉」一句先列「縣嗇夫」，洞庭守禮文書發送的主要對象應是郡內各縣，而非治無定所的嘉、穀和尉等人。相反，嘉、穀和尉三人應該是通過「在所縣」獲得洞庭守禮的指示。我們又可排除一種說法。

排除以上眾多不可能的說法後，本文以為，[16-5] 和 [16-6] 兩牘均是於洞庭郡內在眾縣之間沿道依次傳遞，即所謂的「以道次傳別書」方式。⁹³ 此種方式可

⁹¹ 《奏讞書》案例十八確實提到南郡卒史、段卒史等人的「治所」。但正如初山明所舉周家臺 30 號墓出土的「秦始皇三十四年曆譜」，史職官吏所治之處並不固定，在勤務紀錄中以「治某某」表示。參初山明，《秦漢出土文字史料の研究》，頁 143-150。土口史記在初山明研究的基礎之上，又舉出了嶽麓書院藏秦簡《三十四年質日》「騰與廷史治傳舍」的例子，指出或有史職官吏之治所設於傳舍的情況，明顯是臨時之舉。參土口史記，〈秦代的領域控制與官吏移動〉，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中國人民大學分中心，《出土文獻的世界》，頁 81。按：新公布的里耶秦簡明確提及「西陽獄史治傳」（9-240）和「西陽獄史治傳舍」（9-1184），正好證明土口史記之說。此外，里耶秦簡中提及沅陵獄佐己的治所時，「治所」（8-1729）和「治在所」（8-265、8-492）更是交替出現，可見這些官吏所治之處即可稱為「治所」，並非固定處於一地。

⁹² 參初山明，《秦漢出土文字史料の研究》，頁 127-158。至於「屬」，秦代的文獻中較少見。最近，陳侃理重新修訂睡虎地 11 號墓出土《編年記》的部分釋文，指出曾任安陸和鄢兩縣令史的墓主喜，出任過南郡郡屬一職。參陳侃理，〈睡虎地秦簡《編年記》中「喜」的宦歷〉，《國學學刊》2015.4：50。新公布的里耶 9-2305 牘顯示，卒史和屬同樣負責校計的工作，可知屬的主要職務應與卒史相似。秦代的屬，又可參陳松長等，《秦代官制考論》（上海：中西書局，2018），頁 251-253。

⁹³ 鷹取祐司據 8-657 牘上兩個「傳別書」，推論「別書」為動詞「傳」的「目的語」（即中文的賓語和英文的 object）。但他沒有排除「別」字在其他語境下作為動詞使用。此處暫從其說。參鷹取祐司，《秦漢官文書の基礎的研究》，頁 246。

配合「以郵行」等不同傳遞手段，⁹⁴ 旨在通過沿道路依次傳遞，把上級指令傳遍轄境內各下級機構——正適合洞庭守禮欲把興繇的指示傳遍轄下眾縣之目的。⁹⁵ 不過，「以道次傳別書」一語應是一個原則性的指示，實際從哪一個起始點開始傳送？分多少條道路傳遞？因應個別情況要作何種的調節？從目前公布的里耶秦簡來看，以這種方式傳遞的洞庭郡下行文書大部分均附隨更詳細的說明。然而，由於洞庭守禮於廿七年二月庚寅（十五日）第一次下發文書時，遺漏了相關說明，因此在傳遞過程中產生誤會，鄰縣先後把兩件內容一樣的文書，轉抄發送至遷陵縣。這兩件文書即[16-6]和[16-5]兩牘。為說明此點，我們先仔細看看9-2283 牘上「洞庭守禮重曰」一段的內容：

新武陵別四道，以道次傳別【書＝。（書）】到，輒相報；不報，追之。

皆以郵、門亭行。新武陵言書到。

此牘所見，洞庭郡把文書直接發給新武陵，再由新武陵抄錄四份，分四道傳送各屬縣；新武陵收到洞庭郡的文書後需「言書到」，其他屬縣則沿道相報。⁹⁶ 已有的研究指出，新武陵極可能是洞庭郡設立初年的治所。⁹⁷ 在目前公布的里耶秦簡中，指定以新武陵為中心分四道傳遞文書的，還有例四至七：

例四：

8-649 正

[第一行] 邦尉、都官軍在縣界中者各□

⁹⁴ 過往學者把秦代的傳遞手段分為「以次傳」和「以郵行」兩種，這雖符合秦漢律令的規定，但從里耶出土的文書看，「以道次傳」和「以郵行」經常配合使用。參陳偉等，《秦簡牘整理與研究》，頁 18-26。劉欣寧最近提出，「以道次傳」僅指明傳遞次序，與「以縣次傳」、「以郵行」等傳遞手段有別。參劉欣寧，〈從出土文獻論秦漢帝國的文書傳遞制度〉，發表於韓國慶北大學校史學科 BK 事業團等主辦，「通過簡牘材料看古代東亞史研究國際論壇」（大邱：韓國慶北大學校史學科 BK 事業團，2018.12.17-20），頁 413。

⁹⁵ 就筆者所見，目前公布的洞庭郡發給轄下眾縣的文書（與此相對，是洞庭郡發給單一屬縣如遷陵的文書）大都是使用「以道次傳別書」的方式。參本文所舉例四至十。現藏於里耶秦簡博物館的[12-1784]牘是少有的例外，該牘明確記載「縣一書」，顯然是每縣各發一書。

⁹⁶ 在遷陵縣的下行文書中，凡注明「以次傳書」或「以次傳別書」的，大部分均以縣尉為中心轉發。這些例子中縣尉的角色與9-2283 牘上的新武陵頗有可以比較之處。參9-1088 + 9-1090 + 9-1113 和9-1861。

⁹⁷ 參鄭威，《出土文獻與楚秦漢歷史地理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17），頁 98-106；游逸飛，〈里耶秦簡所見的洞庭郡〉，頁 32-33。

[第二行] 皆以門亭行，新武陵言書到，署□

[第三行] ……

8-649 背

[第一行] ……

[第二行] □母子之子⁹⁸

例五：

8-657 正

[第一行] □亥朔辛丑，琅邪段（假）【守】□敢告內史、屬邦、郡守主：

琅邪尉徙治即【默】□

[第二行] 琅邪守四百卅四里，卒可令縣官有辟、吏卒衣用及卒有物故當辟徵還□

[第三行] 告琅邪尉，毋告＝琅邪守＝。（告琅邪守）固留費，且輒卻論吏當坐者。它如律令。敢□□

[第四行] 【郡】⁹⁹ 一書。·以蒼梧尉印行事。/ 六月乙未，洞庭守禮謂縣魯夫聽書從事，【都】

[第五行] 官¹⁰⁰ 軍吏在縣界中者各告之。新武陵別四道，以次傳別書，寫上洞庭

8-657 背

[第一行] 尉。皆勿留。/ 葆手。

[第二行] / 驕手。/ 八月甲戌，遷陵守丞臚之敢告尉官主；以律令從事。傳別【書】

[第三行] 貳春，下卒長奢官。/ □手。/ 丙子旦食走印行。□

[第四行] □【月庚】午水下五刻，士五（伍）宕渠道□邑疵以來。/ 朝半。 洞□

⁹⁸ 此牘存留的文字雖不多，但從「新武陵言書到」一語可以推知，此牘也是以新武陵為中心以道次傳別書。其背面文字以相反方向書寫，字體潦草，顯然已被重新利用作習字簡。另外，參考例五和例六，「都官軍」之下或脫「吏」字。

⁹⁹ 審圖版，此字右邊從「卩」，參考「官一書」（9-287）、「縣一書」（[12-1780]）、「道一書」（9-713）之例，有可能是「郡」字。

¹⁰⁰ 舊釋文缺釋「都官」二字。審圖版，「官」字仍然清晰可辨，「都」字雖僅存左半，但可據例四和例六補釋。

例六：

9-1759+9-1855+9-1889 正

[第一行] □□丁亥，洞【庭】……下真縣。新武陵別四……□□□

[第二行] 都官軍【吏】……□□當用之，皆下書□……□□□

[第三行] 書到，相……以追，皆以郵行。新【武】……□署東

[第四行] 曹。 / 取□

9-1759+9-1855+9-1889 背

[第一行] 恒□

[第二行] □月甲辰……□□□□□人□以□

例七：

9-1861 正

[第一行] 【廿】六年二月癸丑朔庚申（八日），洞庭段（假）守高謂縣丞：乾萑及管茅善用毆（也）。且燒草矣，以

[第二行] 書到時，令乘城卒及徒隸、居貲贖責勉多取、積之，必各足給縣用，復到乾

[第三行] 草。唯毋乏。它如律令。新武陵布四道，以次傳別書。¹⁰¹ 書到，相報；不報者，追之。新

[第四行] 【武陵言】書到，署廐曹。以洞庭發弩印行事。

9-1861 背

[第一行] 五月乙酉（五日），遷陵守丞敦狐敢告尉：告鄉官主，以律令從事。

[第二行] 以次傳書，勿留。 / 夫手。即走辰行。

[第三行] □□□□□□□□□□【報】酉陽曰：書已到。 / 夫手。即司空史郤行。

[第四行] 五月甲申（四日）水下七刻，焦士五（伍）陽□鼠以來。 / 陽半。 癰手。

¹⁰¹ 參考此例，睡虎地 11 號秦墓出土《語書》「以次傳別書江陵布以郵行」中的「江陵布」，應理解成以江陵為中心發布，而非過去認為的另抄一份在江陵公布。此句或可讀成「以次傳別書，江陵布，以郵行」。並參鷹取祐司，《秦漢官文書の基礎的研究》，頁 253；張馳，〈讀里耶秦簡（貳）9-1861、9-2076 小札〉，簡帛網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3110，2018.05.17，讀取 2019.01.02)。

例七的紀年為秦始皇廿六年（前 221），王翦平定楚江南地在此前一年，當時遷陵置縣僅一年。¹⁰² 例四至六的紀年雖然不清楚，但新武陵應是當時的治所，才會以其為中心分道傳送，估計也屬洞庭郡初立的時期；¹⁰³ 例四仍稱「邦尉」，年代可能尚在秦始皇廿六年統一之前。¹⁰⁴ 這三例均提及在縣界中的「都官軍吏」，符合洞庭郡設置初年的軍事緊張形勢。¹⁰⁵ 例六、七與 9-2283 牘一樣，規定屬縣間收到文書後，需報書回覆。例七與 9-2283 牘顯示，傳書至遷陵縣的是西陽縣。遷陵縣收到文書後，需按指示報書回覆西陽縣，確認收到訊息。西陽縣在行書路線上處於遷陵縣前一站的情況，似乎相對固定。¹⁰⁶ 目前公布的里耶秦簡中，行書西陽縣的，更常稱行或移「旁」。¹⁰⁷ 若以新武陵為中心，分四道以次傳別書，沿道屬縣收到文書後相報回覆，洞庭郡大概可確認其指示順利下達轄下諸縣。

除了以新武陵為中心分道傳書外，目前注明「以道次傳別書」或「以次傳別書」的例子中，還提及以臨沅、門淺、零陽、上沅四道傳書的路線。可參考例八至十：

例八：

8-159 右側

[第一行] 制書曰：舉事可為恒程者上丞相，上洞庭絡帶（裙）程書有□□□

8-159 正

[第一行] 卅二年二月丁未朔□亥，御史丞去疾：丞相令曰：舉事可為恒

[第二行] 程者□上帶（裙）直。即應（應）令弗應（應）？謹案致……

[第三行] ……庭□。 / □手。

[第四行] ……

8-159 背

[第一行] 三月丁丑朔壬辰，洞庭□□□□□□□□□□□□

¹⁰² 陳偉認為洞庭郡很可能是秦始皇廿五年（前 222）二月或以前，平定江南地後設立。參陳偉，《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頁 5；《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二卷）》，頁 3-4。

¹⁰³ 此外，鄭威推測例五所載琅邪郡尉徙治即默一事，應發生於秦始皇廿八年（前 219）。參鄭威，《出土文獻與楚秦漢歷史地理研究》，頁 108-111。

¹⁰⁴ 8-461 牘謂秦統一後改「郡邦尉為郡尉」，例四的「邦尉」或即「郡邦尉」。

¹⁰⁵ 洞庭郡入秦初年的軍事情況，參陳偉，《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二卷）》，頁 4。

¹⁰⁶ 並參例八、十。

¹⁰⁷ 參 8-158、9-2283 和 9-2287，以及前注 64 中的討論。

- [第二行] 令。臨沅下索（索） ^L，門淺、上衍、零陽各以次傳別書□□□□
□
[第三行] 書到，相報；不報，追。門淺、上衍、零陽言書到，署□曹發。
[第四行] / □手。道一書，以洞庭發弩印行事。 恒署。
[第五行] 遷陵報酉陽，署令發。
[第六行] 酉陽報充，署令發。 / 四月癸丑水十一刻 = （刻）下五，都郵人
□以來。 / 發。¹⁰⁸

例九：

9-26

- [第一行] □甲子朔戊子，洞庭……下縣，各以道次傳別書。洞庭尉
[第二行] 吏、執灋屬官在縣界中【者，各】下書焉。洞庭尉下洞庭除道
尉，除道尉下
[第三行] 當用者；鐔成以便近道次盡下新縣，皆以郵行。書到，相報；
[第四行] 【不報者，追。臨沅、門淺、上衍□□】。

例十：

9-713 正

- [第一行] 六月壬午朔戊戌，洞庭段（假）守齕下□：聽書從事。臨沅
[第二行] 下索（索） ^L，門淺、零陽、上衍各以道次傳別書。臨
[第三行] 沅下洞庭都水；蓬下鐵官，
[第四行] 皆以郵行。書到，相報；不報，追。臨沅、門淺、零陽、
[第五行] 【上衍皆言】書到，署兵曹發。 / 如手。道一書，以洞庭候印□

9-713 背

- [第一行] □ 遷陵報酉陽，署主令【發】□
[第二行] 充報零陽，金布發。 恒署。 丁四。
[第三行] 酉陽報充，署令發。
[第四行] 七月己未水十一刻 = （刻）下十，都郵人□以來 / □發

例八和十兩牘顯示，洞庭郡指示分四道發書，臨沅一道直接下索，¹⁰⁹ 其餘門

¹⁰⁸ 釋文參考陳偉等，《秦簡牘整理與研究》，頁 19 修改。

¹⁰⁹ 臨沅一道僅下索一縣，參鷹取祐司，《秦漢官文書の基礎的研究》，頁 268-269 注 32。又陳偉認為「新武陵別四道，以道次傳別書」之「四道」即是臨沅、門淺、零陽、上衍四道。參陳偉等，《秦簡牘整理與研究》，頁 22。新武陵所別之四道，皆是以道次傳別書的。然

淺、零陽、上衍三道「各以道次傳別書」。凡收到文書的皆相報，四道的起始點皆向洞庭郡「言書到」，確保訊息順利傳達。值得注意的是，兩牘特別提及「道一書」，即洞庭郡向每道的起始點只發一書，然後沿道抄寫傳送；與此相對，就是[12-1784]所載的「縣一書」，即洞庭郡向轄下諸縣各發一書。鄭威考證兩條傳遞路線的存續時間，指出「洞庭郡文書以新武陵『別四道』或『布四道』傳遞的時間集中於二十六至二十八年；以『臨沅下索，門淺、零陽、上衍各以道次傳』形式傳遞的集中於三十一年之後」。¹¹⁰ 因應時勢轉變，這些路線會不斷更新。例九除提及臨沅、門淺和上衍等傳書起始點外，特別強調文書抵達鐫成後「以便近道次盡下新縣」。所謂的「新縣」，應當是秦始皇三十三年（前 214）攻取嶺南後設立的縣。¹¹¹ 需要補充的是，這裏特別提及「便近道次」，可見除此以外，必定還有其他可供選擇但距離較遠的「道（路）次（序）」。¹¹² 隨著里耶秦簡的陸續公布，或能揭示洞庭郡內其他傳遞路線。

從秦代洞庭郡的建置和演變歷史來看，不但其郡治或曾經改變，郡內的傳遞路線也曾發生變化。因此，即使注明「以道次傳別書」的文書，一般還會交待文書傳送的起始點，以及分道的數目，以防引起誤會。¹¹²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文書雖然需要注明文書傳送的起始點，但不需說明各道上諸縣的次序，負責官吏似乎對這些次序相當清楚。當時或存在郡級里程簡一類的參考資料，說明洞庭郡內各道上的次序。洞庭郡只需注明傳書的起始點和分道的情況，諸縣的負責官吏即可自

而，臨沅一道直接下索，與其餘三道「各以道次傳別書」理應有別。此外，[16-52]牘除記載「索到臨沅六十里」，亦提及「臨沅到遷陵九百一十里」。如果我們可以藉「索到臨沅」的記載印證例八和十上由臨沅到索一道，是否意味從臨沅到遷陵亦可自成一通？對比同牘所載其他從某地到某地的里程，從臨沅到遷陵達九百一十里，明顯距離遠得多。是否中間還有其他中轉站？不得而知。目前可以參考的證據是 9-1449+9-1713 牘，當中記載某份文書由臨沅送往遷陵，中間便曾經過西陽。總而言之，洞庭郡內的傳遞路線似比過往認識的複雜。新武陵別四道之「四道」是否完全等同於臨沅、門淺、零陽、上衍四道，仍需存疑。

¹¹⁰ 鄭威，〈秦洞庭郡屬縣小議〉，《江漢考古》2019.5：92。

¹¹¹ 鄭威，〈秦洞庭郡屬縣小議〉，頁 92。

¹¹² 居延漢簡中亦有「以道次傳別書」的記載（如注 84 所引居延新簡 E.P.T50:48），但卻沒有更詳細的行書規定。當時的傳書系統應較為成熟，行書路線也許相當固定。另一個可能是，「以道次傳別書」在漢代演變成一種套語，已失去了原來的意義。漢簡中的套語，參富谷至，〈《文書行政の漢帝国》〉，頁 172-216；〈《文書行政における常套句》〉，角谷常子編，〈東アジア木簡学のために〉（東京：汲古書院，2014），頁 33-42。

行查閱各道上的次序。¹¹³ 此外，嶽麓書院藏秦簡〈興律〉記載「諸書求報者，皆告」，可見若要求回覆，必定要先「告」。¹¹⁴ 因此，凡通過「以道次傳別書」傳遞的文書，均需寫明要求屬縣報書回覆。還可注意，上引以新武陵為中心分道傳遞的文書夾雜了「以郵行」（例六）和「以門亭行」（例四）兩種傳遞手段；9-2283 牘更把兩者結合為「以郵、門亭行」。張家山《二年律令·行書律》規定：「畏害及近邊不可置郵者，令門亭卒、捕盜行之。」¹¹⁵ 可知「以門亭行」是不能「以郵行」時的替代選擇，條件是「畏害及近邊不可置郵者」，這正與洞庭郡初立時處於秦西南邊境，且受「反寇」威脅的情況吻合。¹¹⁶ 據此可知，當時洞庭郡內某些地方尚未置郵，僅能以門亭卒代替行書，顯示郵傳系統仍未成熟。在此情況下，文書能否順利傳送，實存在不確定的因素。正因如此，洞庭郡才要說明行書路線，以及明令屬縣相報書回覆，確認收到訊息。

如上節所論，9-2283 牘除了開首重複洞庭守禮最初的指示外，「洞庭守禮重曰」後的均是追加補充的內容。因此在 9-2283 牘之前先後抵達遷陵縣的 [16-6] 和 [16-5] 兩牘，未必能按追加補充的行書指示傳遞。本文推測，當洞庭守禮於二月庚寅日（十五日）第一次發文後，發現沒有指定傳遞路線和明令屬縣相報書回覆，擔心一方面會導致文書可能略過部分屬縣，令重要訊息無法成功傳遞；另一方面會造成同一份文書多次傳遞，衍生過多重複的文書。為了防止有關情況發生，洞庭守禮於兩日後（二月十七日），旋即再次下文發文書，並追加補充行書路線，催促各縣收到文書後需要報書回覆。但事實上，洞庭守禮希望預防的事情還是發生了。由於第一份文書沒有指定具體行書路線，鄰縣（很可能是西陽縣，詳下文）從兩個不同方向收到同一份文書，並先後轉抄發送至遷陵縣，因而產生了

¹¹³ 目前公布里耶出土的里程簡（[16-12]、[16-52]和[17-14]），均屬跨郡或覆蓋較大地域範圍的里程簡，期待將來公布的資料能證明筆者的猜想。北京大學購藏的秦里程簡冊主要涉及南郡內各道的次序和里程。辛德勇認為此簡冊應為南郡基層官吏，因應工作需要摘抄的個人參考資料。參辛德勇，〈北京大學藏秦水陸里程簡冊的性質和擬名問題〉，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簡帛》第8輯，頁17-28。

¹¹⁴ 參陳松長，《嶽麓書院藏秦簡（肆）》，頁161。

¹¹⁵ 彭浩、陳偉、王藤元男主編，《二年律令與奏讞書——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出土法律文獻釋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頁199。值得注意的是，[16-5] 牘上第一個收文紀錄顯示，該牘曾以「求盜」傳送，這符合〈行書律〉中提到若未能置郵，則以「門亭卒、捕盜行之」的規定。從 9-2283、[16-5] 和 [16-6] 三牘的收文紀錄估計，「門亭卒」應是由地方更卒或徒隸擔任之工作。

¹¹⁶ 里耶秦簡中的「反寇」，參9-2287。

[16-6] 和 [16-5] 這兩件正面內容和筆跡近乎一致的木牘。[16-5] 牘背面遷陵丞歐謂「前書已下，重聽書從事」，指的就是此事。當然，另一可能是，由於洞庭守禮初次下發文書中沒有指明屬縣收到文書後需要報書回覆，鄰縣在不肯定文書能否傳遞至遷陵的情況下，重複發了兩次。無論是何者，均是由於洞庭守禮首次下發文書時，沒有作出更仔細的規定所致。否則，我們便難以解釋為何洞庭郡在發書僅兩天後，旋即重新發書追加補充內容，而這一項內容只見於 9-2283 牘上。

換言之，[16-5] 牘不是洞庭守禮重複下發的文書，而是鄰縣重複傳來的文書。從這一種思路分析，[16-5] 牘上兩個收文紀錄，事實上只反映了該文書順次傳遞的其中兩次紀錄。至於為何三牘中只有 [16-5] 牘記載兩個收文紀錄？這或許是刀筆吏誤記的結果。[16-5] 牘背面的第一個收文紀錄，很可能是鄰縣的刀筆吏在收到文書後記錄下來的。這項紀錄本應只出現於鄰縣從上一站收到並留為存檔用的原文書上，不應書於送往遷陵縣的文書。當遷陵縣收到 [16-5] 牘時，只好在此紀錄的右側記下其收文紀錄，因而造成同一文書上有兩個收文紀錄的情況。

正如前述，西陽縣在遷陵縣的檔案中經常被稱「旁」縣。¹¹⁷ 現藏於里耶秦簡博物館的兩件郵書傳遞紀錄（[12-1798]、[12-1799]）顯示，從西陽縣發書以郵行至遷陵縣，三天後便會經過隸屬遷陵縣的啓陵鄉。目前公布的里耶秦簡中，從啓陵鄉直接發書遷陵縣廷，最快兩天後的早上即可送到（8-1525、9-450）。換言之，順利的話，從西陽縣發書至遷陵縣應該不超過六天。假設西陽縣從某縣於二月癸卯日（廿八日）收到洞庭郡的文書，隨即抄錄成 [16-5] 牘傳至遷陵縣，要在十天之後即三月癸丑日（八日）送到遷陵縣，應是可以辦到的事。¹¹⁸

根據本文的分析，9-2283、[16-5] 和 [16-6] 三牘顯示相關文書的收發、傳遞和處理過程或可整理成附表二。值得一提，三牘抵達遷陵縣的順序為：[16-6]（三月戊申〔三日〕）→[16-5]（三月癸丑〔八日〕）→9-2283（三月丁巳〔十二日〕）。這個順序正好與三牘的編聯和疊壓順序相反，顯示編聯存檔時，負責的刀筆吏把最遲收到和處理的 9-2283 牘放在冊書的最前，最早收到的 [16-6] 牘放在最後。疊起來後，9-2283 牘剛好朝上存放。

最後，為何遷陵丞歐在三月丁巳（十二日）收到「重曰」文書後，沒有立即處理，反而急於翌日（三月十三日）把八日之前（三月五日）遷陵守丞敦狐的處

¹¹⁷ 秦律中有不少關於「旁縣」的規定，參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伍）》（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7），頁 119-120，簡 1683 和 1613。

¹¹⁸ 9-2610 殘牘提到「西陽非遠毆（也）」，可能是相對遷陵而言。然而，亦有其他例子顯示從西陽到遷陵需要較長時間（如 9-986、9-2287）。為何如此？仍待更多資料公布才能斷言。

理紀錄抄寫上報洞庭郡？可能的推測是，遷陵丞歐在收到「重曰」文書後，為顯示遷陵縣沒有怠慢，因此把遷陵縣第一次收到文書後的處理紀錄，抄寫呈上洞庭郡；同時，這也在表示當日遷陵縣收到洞庭守禮的第一份文書後，若處理上有任何不慎之處，責任並不在他，而在當時的負責人——遷陵守丞敦狐。¹¹⁹ 這充分體現了秦代官吏在嚴格的律令之下，對自己和他人的責任之自覺。

四・結論

本文的主要發現和論點可綜合整理成以下五點：

第一，9-2283、[16-5]和[16-6]三牘上反印文顯示，三者曾疊在一起存放，配合三牘上的編繩痕跡分析，本文推論三牘在編聯後曾以「折頁」方式收納。三牘從右至左，按 9-2283、[16-5]和[16-6]這個順序編聯。收藏時，9-2283 背面往[16-5]背面對折，[16-5]正面往[16-6]正面對折。疊起時，9-2283 正面朝上，[16-6]背面朝下。這是目前公布秦漢出土行政文書中，首個可論證以「折頁」形式收藏的例子。

第二，9-2283、[16-5]和[16-6]三牘上均載有洞庭守禮初次下達，關於興發勞動力運輸甲兵的指示。對比這段互見重文的筆跡，三牘大體風格趨同，但 9-2283 牘個別文字的筆跡與[16-5]和[16-6]兩牘有異。本文以為，即使不同抄手，在抄寫重要文書時，可能受源自同一祖本的底本影響，寫出風格接近的文字。[16-6]、[16-5]兩牘正面與 9-2283 牘正面主體部分，有可能分別由鄰縣的兩位刀筆吏，根據同一份文書底本抄寫，並先後傳遞至遷陵縣。

第三，里耶秦簡中的「重」字，字面上可解作「重複」、「重新」和「再次」等。就其代表的文書程序而言，與「追」相似，均有催促回覆或追加補充資料的作用。目前公布的里耶秦簡所見，發文機構不等待收文機構回覆，在短時間之內就發書催促或補充資料，是相當常見的現象。洞庭守禮在距離第一次發書後兩天，旋即「重曰」規定行書路線和明令屬縣報書回覆，應從這一背景下理解。

第四，在排除各種不可能解釋後，本文認為 9-2283、[16-5]和[16-6]三牘均是按「以道次傳別書」的方式傳送。然而，由於洞庭守禮在廿七年二月庚寅

¹¹⁹ 在目前公布的里耶秦簡中，遷陵守丞敦狐最遲出現於廿七年三月辛亥（六日），遷陵丞歐則最早出現於同月丙辰（十一日）。估計遷陵丞歐是在這段期間上任，丁巳（十二日）收到「重曰」文書後，於翌日「寫上」遷陵守丞敦狐的處理紀錄，釐清責任的歸屬。參 8-1510 和[16-5]。

（十五日）第一次發書時沒有規定行書路線和明令屬縣報書回覆，鄰縣（很可能是西陽縣）先後把兩份內容一樣的文書傳抄至遷陵縣。這兩份文書即是[16-6]和[16-5]兩牘。由此推敲，[16-5]牘上兩個收文紀錄，只是該文書在洞庭郡屬縣間順次傳遞的其中兩次紀錄；而三牘中唯獨此牘記有兩次紀錄，很可能是刀筆吏誤記的結果。

第五，[16-6]、[16-5]和 9-2283 三牘先後在廿七年三月戊申（三日）、癸丑（八日）和丁巳（十二日）抵達遷陵縣，這個順序剛好與三牘的編聯和疊壓次序相反。這意味著三牘在編聯存檔時，把最遲收到的 9-2283 牘置於冊書之首，最早收到的[16-6]牘置於冊書之末。疊起存放時，最後處理的 9-2283 牘剛好朝上。這個例子正好說明，簡牘文書的物質形態分析和文字內容研讀，是研究出土簡牘兩個不可割裂的範疇。

以上所論，不乏大膽臆測和推論的成份。要之，結合出土簡牘的物質形態和文字內容進行研究的「簡牘文書學」，仍是相對年輕的領域。¹²⁰ 這種研究主要仰賴新材料的發現。在目前中國大陸每年均有重大發現的情況下，今日學者之各種結論，固有可能成為將來研究之基礎，但也隨時會因新資料而被完全廢棄。謹以此個案研究與同道共勉。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十四日凌晨初稿，十二月十二日初次修訂；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九日二訂，六月六日三訂，八月二十日定稿。

（本文於民國一〇八年一月十九日收稿；同年六月二十日通過刊登）

後記

筆者關於里耶秦簡 9-2283、[16-5]和[16-6]三牘反印文的初步討論，曾於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二日在「簡帛網」上發表，本文對此部分續有增補。本文撰寫和修改過程中，多次向張春龍先生請教里耶秦簡的出土情況和相關的

¹²⁰ 參韋山明，〈簡牘文書學與法制史〉，頁 38-39。可與中國簡牘文書學比較的，除了日本的古文書學外，還有自十八世紀末發展而來的古埃及莎草紙學 (papyrology)。參 James G. Keenan, "The History of the Discipline,"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apyrology*, ed. Roger S. Bagnall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59-78。

考古學知識。唐俊峰和史達 (Thies Staack) 兩兄曾閱讀本文初稿或其中關於反印文的內容，惠示寶貴意見。初稿於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七至二十日，由韓國慶北大學校史學科 BK 事業團、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和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中國歷史研究中心主辦的「通過簡牘材料看古代東亞史研究國際論壇」上宣讀，得到楊振紅、金秉駿和魯家亮等諸位先生指教。最後投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蒙兩位匿名審查人指正，在此一併致謝！

補記

拙稿完成後，又閱讀到一些材料，可供讀者參考。羅馬史學者 Jacqueline Austin 指出，如同在十七世紀的英國，對羅馬專業的文書人員來說，「學習書寫，意味著掌握數種書寫風格」(learning to write meant mastering several script styles)。¹²¹ 以此比照，秦漢刀筆吏（以「史」為主）能夠按需要寫出不同風格的文字，實不稀奇：這正是他們與一般僅僅「能書」之人的基本區別。¹²² 此外，張春龍先生於二〇一九年九月六至八日，在「首屆中日韓出土簡牘研究國際論壇暨第四屆簡帛學的理論與實踐學術研討會」發表〈《里耶秦簡》7-1 和 7-11〉一文。該文首次公布了出土號[7-11]的釋文，該牘提及「新武陵布四道，各以道次傳別書，都官軍吏在縣界中者各傳別書」。洞庭郡以新武陵為中心分道傳書的個案，又增一例（第六例）。此例同是「以門亭行」，遷陵縣報書對象同是「西陽」縣。此例紀年殘缺，但從「都官軍吏在縣界中者各傳別書」一句推知，與本文所舉例四至六相似，應屬立郡初年的情況。由於圖版尚未正式公布，僅補記於此供讀者參考；同時，感謝張先生賜閱此文。¹²³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七日













































































































¹²¹ Jacqueline Austin, "Writers and Writing in the Roman Army at Dura-Europos" (PhD diss.,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2010), section 9.2.













































































































¹²² 西北漢簡常見「史」和「能書」等評核用語，筆者同意兩者應有一定區別，而非僅為套語。參邢義田，〈漢代邊塞隧長的文書能力與教育——對中國古代基層社會讀寫能力的反思〉，氏著，《今塵集》，頁 43-97。













































































































¹²³ 張春龍，〈《里耶秦簡》7-1 和 7-11〉，發表於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等主辦，「首屆中日韓出土簡牘研究國際論壇暨第四屆簡帛學的理論與實踐學術研討會」（北京：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2019.09.06-8）。













































































































附表一：9-2283、[16-5] 和 [16-6] 三牘正面重複內容逐字對比表











































































	廿	七	年	二	月	丙	子	朔	庚
9-2283									
[16-5]									
[16-6]									
	寅	洞	庭	守	禮	謂	縣	嗇	夫
9-2283									
[16-5]									
[16-6]									
	卒	史	嘉	段	卒	史	穀	屬	尉
9-2283									
[16-5]									
[16-6]									
	令	曰	傳	送	委	輸	必	先	悉
9-2283									
[16-5]									
[16-6]									

	行	城	旦	春	隸	臣	妾	居	貲
9-2283									
[16-5]									
[16-6]									
	贖	責	急	事	不	可	留	乃	興
9-2283									
[16-5]									
[16-6]									
	繇	厶	今	洞	庭	兵	輸	內	史
9-2283									
[16-5]									
[16-6]									
	及	巴	南	郡	蒼	梧	輸	甲	兵
9-2283									
[16-5]									
[16-6]									







	當	傳	者	多	節	傳	之	必	先
9-2283									
[16-5]									
[16-6]									
	悉	行	乘	城	卒	隸	臣	妾	城
9-2283									
[16-5]									
[16-6]									
	旦	春	鬼	薪	白	粲	居	貲	贖
9-2283									
[16-5]									
[16-6]									
	責	司	寇	隱	官	踐	更	縣	者
9-2283									
[16-5]									
[16-6]									

	𠂔	田	時	毆	不	欲	興	黔	首
9-2283									
[16-5]									
[16-6]									
	嘉	穀	尉	各	謹	案	所	部	縣
9-2283									
[16-5]									
[16-6]									
	卒	徒	隸	居	貲	贖	責	司	寇
9-2283									
[16-5]									
[16-6]									
	隱	官	踐	更	縣	者	簿	有	可
9-2283									
[16-5]									
[16-6]									

	令	傳	甲	兵	縣	弗	令	傳	之
9-2283									
[16-5]									
[16-6]									
	而	興	=	黔	=	首	=	可	省
9-2283									
[16-5]									
[16-6]									
	少	弗	省	少	而	多	興	者	輒
9-2283									
[16-5]									
[16-6]									
	劾	移	縣	=	亟	以	律	令	具
9-2283									
[16-5]									
[16-6]									

	論	當	坐	者	言	名	夫	泰	守
9-2283									
[16-5]									
[16-6]									
	府	嘉	穀	尉	在	所	縣	上	書
9-2283									
[16-5]									
[16-6]									
	嘉	穀	尉	令	人	日	夜	端	行
9-2283									
[16-5]									
[16-6]									
	它	如	律	令					
9-2283									
[16-5]									
[16-6]									

馬增榮

	如	手							
9-2283									
[16-5]									
[16-6]									

附表二：9-2283、[16-5] 和 [16-6] 三牘顯示相關文書的收發、傳遞和處理過程
 （灰底者顯示三牘抵達遷陵縣的日期）

二月十五日 洞庭郡向屬縣 下發關於興絲 的指示（9-2283、 [16-5]、[16-6]正）	二月十六日	二月十七日 洞庭郡重新發 出文書，追加 補充資料 （9-2283 正、背）	二月十八日	二月十九日	二月二十日
二月二十一日	二月二十二日	二月二十三日	二月二十四日	二月二十五日	二月二十六日
二月二十七日	二月二十八日 洞庭郡指示從 某縣送到西陽 縣（[16-5]背）	二月二十九日	二月三十日	三月一日	三月二日
三月三日 洞庭郡指示首 次從西陽縣送 到遷陵縣 （[16-6]正）	三月四日	三月五日 遷陵縣首次把 洞庭郡指示轉 發下級，同日 送出（[16-6]背）	三月六日	三月七日	三月八日 洞庭郡指示第 二次從西陽縣 送到遷陵縣 （[16-5]正）
三月九日	三月十日	三月十一日 遷陵縣第二次 把洞庭郡指示 轉發下級，同 日送出 （[16-5]背）	三月十二日 洞庭郡重新發 出的文書從西 陽縣送到遷陵 縣（9-2283 正）	三月十三日 遷陵縣把[16-6] 牘上的處理紀 錄寫上洞庭郡 （[16-6]背）	三月十四日 遷陵縣寫上洞 庭郡的處理紀 錄啟程送出 （[16-6]背）
三月十五日	三月十六日 遷陵縣第三次 把洞庭郡指示 轉發下級，以 及首次報書西 陽縣（[16-5]背）	三月十七日 遷陵縣轉下級 和報書西陽縣 的文書啟程送 出（[16-5]背）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

二・考古及簡牘報告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

2012 〈北京大學藏秦簡牘室內發掘清理簡報〉，《文物》2012.6：32-44。

里耶秦簡博物館、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中國人民大學中心
編著

2016 《里耶秦簡博物館藏秦簡》，上海：中西書局。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

1986 《信陽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

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

2016 《長沙尚德街東漢簡牘》，長沙：嶽麓書社。

荊州博物館

2009 〈湖北荊州謝家橋一號漢墓發掘簡報〉，《文物》2009.4：26-42。

張春龍

2019 〈《里耶秦簡》7-1 和 7-11〉，發表於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等主辦，「首屆中日韓出土簡牘研究國際論壇暨第四屆簡帛學的理論與實踐學術研討會」，北京：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2019.09.06-8。

張德芳主編

2016 《居延新簡集釋》，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

陳松長主編

2015 《嶽麓書院藏秦簡（肆）》，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

2017 《嶽麓書院藏秦簡（伍）》，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

陳偉主編

2012 《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

2014 《秦簡牘合集·壹》，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

2018 《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二卷）》，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

陳偉、熊北生

2019 〈睡虎地漢簡中的券與相關文書〉，《文物》2019.12：53-62。

彭浩、陳偉、工藤元男主編

2007 《二年律令與奏讞書——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出土法律文獻釋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2009 〈里耶一號井的封檢和束〉，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湖南考古輯刊》8，長沙：嶽麓書社，頁 65-70。

2012 《里耶秦簡（壹）》，北京：文物出版社。

2017 《里耶秦簡（貳）》，北京：文物出版社。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

2007 《里耶發掘報告》，長沙：嶽麓書社。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文物處

2003 〈湘西里耶秦代簡牘選釋〉，《中國歷史文物》2003.1：8-25。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文物處、龍山縣文物管理所

2003 〈湖南龍山里耶戰國——秦代古城一號井發掘簡報〉，《文物》2003.1：4-35。

熊北生、陳偉、蔡丹

2018 〈湖北雲夢睡虎地 77 號墓出土簡牘概述〉，《文物》2018.3：43-53。

三·近人論著

于洪濤

2013 〈里耶簡「御史問直絡羈程書」傳遞復原——兼論秦漢〈行書律〉的實際應用〉，王沛主編，《出土文獻與法律史研究》第 2 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頁 43-60。

土口史記

2018 〈秦代的領域控制與官吏移動〉，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中國人民大學分中心編，《出土文獻的世界——第六屆出土文獻青年學者論壇論文集》，上海：中西書局，頁 79-91。

王煥林

2007 《里耶秦簡校詁》，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

后曉榮

2009 《秦代政區地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安部聰一郎

2006 〈試論走馬樓吳簡所見名籍之體式〉，長沙簡牘博物館、北京吳簡研討班編，《吳簡研究》第 2 輯，武漢：崇文書局，頁 14-24。

吳方基

2018 〈里耶秦簡「付受」與地方國有財物流轉運營〉，《中華文化論壇》2018.4：59-67。

馬增榮

辛德勇

- 2013 〈北京大學藏秦水陸里程簡冊的性質和擬名問題〉，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主編，《簡帛》第 8 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頁 17-28。

李孟濤

- 2008 〈試談郭店楚簡中不同手蹟的辨別〉，卜憲群、楊振紅主編，《簡帛研究二〇〇六》，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頁 10-29。

李零

- 2008 《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北京：三聯書店，修訂本。

沈剛

- 2016 〈秦代縣級檔案文書的處理周期——以遷陵縣為中心〉，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編，《出土文獻研究》第 15 輯，上海：中西書局，頁 127-144。

尚芸曉

- 2015a 〈清華簡《算表》首簡簡序及收卷形式小議〉，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主編，《簡帛》第 10 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頁 67-77。
2015b 〈清華簡收卷研究舉例〉，李學勤主編，《出土文獻》第 7 輯，上海：中西書局，頁 172-186。

角谷常子

- 2013 〈論里耶秦簡的單獨簡〉，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簡帛》第 8 輯，頁 161-178。

邢義田

- 2011 〈湖南龍山里耶 J1(8)157 和 J1(9)1-12 號秦牘的文書構成、筆跡和原檔存放形式〉，氏著，《治國安邦：法制、行政與軍事》，北京：中華書局，頁 473-498。
2019a 〈漢代邊塞隧長的文書能力與教育——對中國古代基層社會讀寫能力的反思〉，氏著，《今塵集：秦漢時代的簡牘、畫像與文化流播》，上海：中西書局，頁 43-97。
2019b 〈漢代簡牘公文書的正本、副本、草稿和簽署問題〉，氏著，《今塵集》，頁 191-254。
2019c 〈漢晉公文書上的「君教『諾』」、署名和畫諾——讀《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選釋》札記〉，氏著，《今塵集》，頁 313-329。
2019d 〈「手、半」、「曰玚曰荊」與「遷陵公」——里耶秦簡初讀之一〉，氏著，《今塵集》，頁 366-371。

來國龍

- 2007 〈論戰國秦漢寫本文化中文本的流動與固定〉，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主編，《簡帛》第 2 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頁 516-527。

姚磊

- 2017 〈里耶秦簡第 9 層 1-12 號木牘的反印文及其疊壓關係〉，《中國文字》新 43：145-165。

舩山明

- 2015 《秦漢出土文字史料の研究—形態・制度・社会—》，東京：創文社。
2016 〈簡牘文書學與法制史——以里耶秦簡為例〉，柳立言主編，《史料與法史學》，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頁 37-68。

侯旭東

- 2019 〈西北出土漢代文書簡冊的排列與復原〉，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主編，《簡帛》第 18 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頁 109-132。

胡平生

- 2004 〈湘西里耶秦簡〉，胡平生、李天虹著，《長江流域出土簡牘與研究》，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頁 304-324。

宮宅潔

- 2019 〈關於里耶秦簡 8-755~759 簡與 8-1564 簡的編聯〉，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簡帛》第 18 輯，頁 29-36。

凌文超

- 2015 《走馬樓吳簡採集簿書整理與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唐俊峰

- 2018 〈秦代遷陵縣行政信息傳遞效率初探〉，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主編，《簡帛》第 16 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頁 191-230。

馬怡

- 2007 〈里耶秦簡選校〉，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編委會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第 4 集，北京：商務印書館，頁 133-186。

馬增榮

- 2018 〈漢代地方行政中的直符制度〉，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簡帛》第 16 輯，頁 253-277。

高震寰

- 2015 〈試論秦漢簡牘中的「守」，「假」，「行」〉，王沛主編，《出土文獻與法律史研究》第 4 輯，上海：人民出版社，頁 58-79。

馬增榮

張忠偉

- 2016 〈里耶秦簡博物館藏秦簡概說〉，里耶秦簡博物館、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中國人民大學中心，《里耶秦簡博物館藏秦簡》，頁 1-23。

張春龍、初山明、大川俊隆

- 2015 〈里耶秦簡刻齒簡研究——兼論嶽麓秦簡《數》中的未解讀簡〉，《文物》2015.3：53-69, 96。

張馳

- 2016 〈《里耶秦簡（壹）》文書學研究〉，武漢：武漢大學歷史學院碩士論文。
- 2017 〈《里耶秦簡（壹）》所見「往來書」的文書學考察〉，李學勤主編，《出土文獻》第 10 輯，上海：中西書局，頁 164-179。

陳侃理

- 2015 〈睡虎地秦簡《編年記》中「喜」的宦歷〉，《國學學刊》2015.4：47-50。
- 2018 〈里耶秦簡牘所見的時刻記錄與記時法〉，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簡帛》第 16 輯，頁 179-190。

陳松長等

- 2018 《秦代官制考論》，上海：中西書局。

陳偉等

- 2017 《秦簡牘整理與研究》，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

陳劍

- 2011 〈讀秦漢簡札記三篇〉，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 4 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頁 358-380。

單育辰

- 2014 〈里耶秦公文流轉研究〉，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主編，《簡帛》第 9 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頁 199-209。

游逸飛

- 2015 〈里耶秦簡所見的洞庭郡——戰國秦漢郡縣制個案研究之一〉，《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61：29-67。

馮勝君

- 2004 〈從出土文獻談先秦兩漢古書的體例（文本書寫篇）〉，《文史》2004.4：25-35。

黃展岳

- 2008 〈南越木簡選釋〉，氏著，《先秦兩漢考古論叢》，北京：科學出版社，頁 446-455。

黃浩波

- 2019 〈蒲封：秦漢時期簡牘文書的一種封緘方式〉，《考古》2019.10：98-105。

楊先雲

- 2018 〈秦代行政文書制度管窺——讀里耶秦簡札記〉，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中國人民大學分中心，《出土文獻的世界》，頁 102-110。

楊振紅、單印飛

- 2014 〈里耶秦簡 J1(16)5、J1(16)6 的釋讀與文書的製作、傳遞〉，《浙江學刊》2014.3：16-24。

賈連翔

- 2015 〈反印墨跡與竹書編連的再認識〉，李學勤主編，《出土文獻》第 6 輯，上海：中西書局，頁 229-245。

劉自穩

- 2017 〈里耶秦簡中的追書現象——從睡虎地秦簡一則行書律說起〉，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編，《出土文獻研究》第 16 輯，上海：中西書局，頁 147-164。

劉欣寧

- 2018 〈從出土文獻論秦漢帝國的文書傳遞制度〉，發表於韓國慶北大學校史學科 BK 事業團等主辦，「通過簡牘材料看古代東亞史研究國際論壇」，大邱：韓國慶北大學校史學科 BK 事業團，2018.12.17-20。

廣瀨薰雄

- 2019 〈也談里耶秦簡〈御史問直絡裙程書〉〉，氏著，《簡帛研究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頁 117-136。

鄭威

- 2017 《出土文獻與楚秦漢歷史地理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
2019 〈秦洞庭郡屬縣小議〉，《江漢考古》2019.5：89-94。

魯家亮

- 2018 〈里耶秦簡所見秦遷陵縣吏員的構成與來源〉，李學勤主編，《出土文獻》第 13 輯，上海：中西書局，頁 201-221。

黎明釗、馬增榮

- 2010 〈試論里耶秦牘與秦代文書學的幾個問題〉，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主編，《簡帛》第 5 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頁 56-76。

馬增榮

蕭靜華

- 2005 〈從實物所見三國吳簡的製作方法〉，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長沙三國吳簡暨百年來簡帛發現與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頁 24-27。

錢存訓

- 2006 《書於竹帛：中國古代的文字紀錄》，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

伊藤敏雄

- 2013 〈長沙吳簡中の「叩頭死罪白」文書木牘小考—文書木牘と竹簡との編綴を中心に—〉，《歴史研究》51：29-48。

呂靜

- 2010 〈秦代における行政文書の管理に関する考察—里耶秦牘の性格をめぐって—〉，《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158：280 (1)~253 (28)。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簡牘研究班編

- 2015 《漢簡語彙—中国古代木簡辞典—》，東京：岩波書店。

富谷至

- 2010 《文書行政の漢帝国—木簡・竹簡の時代—》，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
- 2014 〈文書行政における常套句〉，角谷常子編，《東アジア木簡学のために》，東京：汲古書院，頁 33-42。

富谷至編

- 2015 《漢簡語彙考証》，東京：岩波書店。

陶安あんど

- 2011 〈書写材料とモノの狭間—日本木簡学との比較を通じてみた中国簡牘学のジレンマ—〉，舩山明、佐藤信編，《文献と遺物の境界：中国出土簡牘史料の生態的研究》，東京：六一書房，頁 271-279。

陳偉

- 2013 〈關於秦文書制度的幾個問題〉，渡邊義浩編，《中国新出資料学の展開：第四回日中学者中国古代史論壇論文集》，東京：汲古書院，頁 43-53。

藤田勝久

- 2009 《中国古代国家と社会システム—長江流域出土資料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
- 2013 〈里耶秦簡所見秦代郡縣的文書傳遞〉，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簡帛》第 8 輯，頁 179-194。

鷹取祐司

- 2015 《秦漢官文書の基礎的研究》，東京：汲古書院。

Austin, Jacqueline

- 2010 “Writers and Writing in the Roman Army at Dura-Europos.” PhD diss.,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Chen Wei and Cai Dan

- 2020 “Yue Ren, Luli, and Anlu: the Tomb Occupant of Yunmeng Shuihudi Han Tomb No. 77 and the Village Where He Resided.” *Bamboo and Silk* 3.2: 232-274.

Keenan, James G.

- 2009 “The History of the Discipline.”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apyrology*, edited by Roger S. Bagnall.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59-78.

Lewis, Mark Edward

- 1999 *Writing and Authority in Early China*.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Ma, Tsang Wing

- 2015 “Qin Management of Human Resources in Light of an Administrative Document from Liye, Hunan Provinc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9th Annual Southeast Early China Roundtabl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Knoxville, October 30-November 1, 2015.
- 2017 “Scribes, Assistants, and the Materiality of Administrative Documents in Qin-Early Han China: Excavated Evidence from Liye, Shuihudi, and Zhangjiashan.” *T'oung Pao* 103.4/5: 297-333.

Richter, Matthias

- 2006 “Tentative Criteria for Discerning Individual Hands in the Guodian Manuscripts.” In *Rethinking Confucianism: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xcavated Chinese Manuscripts, Mount Holyoke College, April 2004*, edited by Xing Wen. San Antonio: Trinity University Press, pp. 132-147.
- 2009 “Faithful Transmission or Creative Change: Tracing Modes of Manuscript Production from the Material Evidence.” *Asiatische Studien/Études Asiatiques* 63: 889-908.

馬增榮

- 2011 “Textual Identity and the Role of Literacy in the Transmission of Early Chinese Literature.” In *Writing and Literacy in Early China*, edited by Li Feng and David Prager Branner.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pp. 206-236.

Staack, Thies

- 2018 “Single- and Multi-Piece Manuscripts in Early Imperial China: On the Background and Significance of a Terminological Distinction.” *Early China* 51: 1-51.

Tsien, Tsuen-hsuei

- 2004 *Written on Bamboo & Silk: The Beginnings of Chinese Books & Inscrip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Yates, Robin D. S.

- 2012/13 “The Qin Slips and Boards from Well No. 1, Liye, Hunan: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Qin Qianling County Archives.” *Early China* 35/36: 292-329.

四・網路資訊

馬增榮

- 2018 〈里耶秦簡 9-2283、[16-5]和[16-6]三牘的反印文和疊壓關係〉，簡帛網，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3209，2018.08.22，讀取 2019.05.17。

陳劍

- 2018 〈馬王堆帛書的「印文」、空白頁和襯頁及折疊情況綜述〉，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4202>，2018.01.01，讀取 2019.01.02。

張馳

- 2018 〈讀里耶秦簡（貳）9-1861、9-2076 小札〉，簡帛網，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3110，2018.05.17，讀取 2019.01.02。

謝坤

- 2018 〈《里耶秦簡（貳）》札記（一）〉，簡帛網，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3108，2018.05.17，讀取 2019.01.02。

A Case Study of the Qin Wooden Administrative Documents: The Materiality, Textual Composition, and Delivery Methods of Slips 9-2283, [16-5], and [16-6] from the Liye Archive

Tsang Wing Ma

Department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Macau

The two unearthed wooden slips [16-5] and [16-6] were of the earliest batch made public from the Liye archive. They bore the same instruction from Governor (*shou*) Li of Dongting commandery on mobilizing laborers to transport armaments from Dongting commandery to the Capital and other commanderies in the 27th year into the reign of Qin Shi Huang (220 BCE). Regarding the slips in question, much emphasis has been placed on how administrative documents were handled in the Qin dynasty. However, no breakthrough has been made given the restriction in the existing finds. In the second volume of *Liye Qin jian*, the most recently released wooden slip 9-2283 bore clear resemblance to slips [16-5] and [16-6] in terms of content and material features, which in turn may resolve problems in the current research. The mirror-inverted imprints indicated that the three slips had once been placed one on top of the other. In addition, the traces of binding cords found on the three slips revealed that they had once been folded up as an “accordion” for storage after being bound with two sets of cords. Originally, the three slips were to be delivered as per prescribed route from Dongting commandery to Qianling county. There was no clear delivery itinerary designated by Dongting commandery, nor were the subordinate counties ordered to inform one another of respective receipt of documents. This would result in the wooden slips [16-5] and [16-6] being duplicated and delivered twice from a neighboring county to Qianling county. The slip 9-2283 bearing a mandate and being subsequently added in haste by Dongting commandery was the last of the three to arrive in Qianling county. In the analysis of the slips’ binding order,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such order ran counter to the order of the three slips’ arrival in Qianling county. In other words, the latest to arrive was placed on top, while the earliest was at the bottom.

馬增榮

In all, the above discovery may initiate 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many issues currently surrounding administrative documents of the Qin dynasty.

Keywords: Liye archive, Qianling county, mirror-inverted imprints, accordion fold, delivery method